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 Shidai Jingji Mingjia Jingdian Wencong

张卓元

经济文选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编委会

主 编：张卓元 周叔莲 吕 政 汪海波

编 委：王梦奎 厉以宁 刘 伟 刘国光 刘诗白
吴敬琏 陈佳贵 冒天启 洪银兴 黄 达
蔡 眇 薛小和

（按姓氏笔画排序）

策 划：宋灵恩 海 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卓元经济文选/张卓元著.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1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张卓元等主编)

ISBN 978 - 7 - 80221 - 984 - 7

I. 张… II. 张…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683 号

张卓元经济文选

张卓元著

出版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 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9.875
印 数	1 ~ 5000 册
字 数	35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1 - 984 - 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ZI XU]

自序

我从 1954 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 年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至今已有 54 个春秋。期间，1983 年至 1993 年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从事流通经济研究工作，着重研究中国价格改革问题；1993 年至 1995 年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名家较多，研究气氛比较浓厚，学术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多，第一、二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分别于 1959 年和 1979 年举行），经济所都是具体承办单位，很多研究人员（包括我自己）都是参会者和工作人员，因此，像我这样智力平庸之辈经过努力也能在经济研究方面作出一些成果，目前已出版专著三部、论文集八部、主编著作十余部，2006 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还带出了近 40 位经济学博士。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说到工作经历，不能不说一下，自 1993 年夏开始，参加过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能够看到大量的资料，听到许多在研究所听不到的信息，更好地掌握中国国情，了解中央重大战略、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依据以及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与此同时，还能在工作和讨论过程中，贡献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并常感到用时方恨少。每起草完一次文件，我都会写文章谈学习心得，宣传文件精神并尽可能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和发挥。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中，此类文章占了相当一个比重。

编入本书的文章共 40 篇。这些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的代表作。分六个板块，一为经济理论研究，二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四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五为国有企业改革，六为价格改革。每一板块的文章按发表时序排列。除了个别文字



改动外，文章按发表时原貌编入。本书 40 篇文章，其中有 18 篇未编入过已出版的文集，在这 18 篇文章中有 11 篇是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包括几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回顾与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作这样的选择，重要原因是减少文章重复发表的次数。

下面拟对我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作一简要介绍：

一、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稳健派”代表之一

1979 年以来，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致力于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生活重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教授和我主持，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 ~ 1995）改革纲要，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此后，我多次发表文章，主张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不要企求“一次到位”。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在于寻找增长和稳定的最佳结合点。14 年前，我曾写文章认为，“6% 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 9% 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1978 ~ 2007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速 9.8%，CPI 年均上涨率 5.7%，说明我的设想与实际还比较接近。因此，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子。

二、主张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我就主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有人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时，我写文章阐述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1988 年，我还在自己的专著《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中明确指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后，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公有制要着力适应市场经济，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



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这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伟大创举，是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和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性的最有力证明。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我还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若干规律，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我个人打算今后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以期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

三、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研究的重要领域。多年来，我发表文章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是主张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认为中央企业要加快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尽快改变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一级）仍是国有独资和尚未转为现代公司的状况。二是主张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进展不够快，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成为改革的瓶颈。原因之一是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为推进改革攻坚，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三是主张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直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数量仍然太多，达11万家，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并分布于一般竞争性领域，需按党的方针加快放开搞活，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行业和领域。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如不加快步伐，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还要提及，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在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对三十年中国国企改革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实现微观经济基础再造；坚持循序渐进，从放权让利到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从明晰产权到国有出资人到位，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步步深入；坚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企求把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搞好；坚持“抓大放小”，着力搞好中央企业；坚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坚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债务重组，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坚持把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地上升为理论和提升为法律，指导改革规范进行。

四、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探索中国价格改革规律性

我在1983～1993年担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期间，主要研究价格改革及其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有些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是较早主张价格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方向，我认为光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的，必须着力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让价格在市场交换中形成，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结构。影子价格、决策价格体系不能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二是强调价格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认为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经济运行从行政指令为主向市场协调为主转轨的关键。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价格改革顺利推进，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向市场主导型转轨。进入新世纪后，我一再呼吁加快要素和资源市场化价格改革，指出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三是较早鲜明主张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不失时机地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并同主张向计划单轨制过渡的观点进行争辩。同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工业生产资料供需矛盾缓解，双轨价差已缩小至一倍以内甚至50%以内，并轨条件已经具备，应不失时机地进行并轨。四是初步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包括：价格改革主要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为主到市场定价为主的过渡；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价格水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等等。

五、主张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在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而要完善新体制，就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同时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实践一再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



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制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加强和健全金融监管；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有赖于改进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赖于政府有效的管理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的推进，逐步使改革和发展均纳入法治的轨道。我认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很重，还要在一些环节和领域进行改革攻坚。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实现，目前仍在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还要继续奋斗40年，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有许多新的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经济学家概括，探索新的规律性。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不断涌现理论创新成果的年代。我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大家一起，研究新问题，概括新经验。



— —

社会评价

SHEHUIPINGJIA

「ZUOZHE JIANLI
作者简历」

张卓元，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44年9月~1950年7月在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学习；1950年9月~1953年7月在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1954年7月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54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业务专长：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



主要社会兼职：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价格学（协）会顾问，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ZHUYAOZHUZUO¹

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张卓元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新价格模式的建立与市场发育的关系》（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面对发展之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

《政治经济学大辞典》（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思考》（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论中国所有制改革》（与胡家勇、刘学敏合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张卓元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张卓元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论文选集

LUNWEN XUANJI



2000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向阳著的《走进中国经济学家》一书中，有一篇3万字篇幅的文章评介了我的经济学观点，标题是《“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记张卓元》。在该书目录中作了这样的介绍：“他是孙冶方的得意弟子和‘忠实追随者’……他担起了孙冶方留下的重担……他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取向……他是‘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实行稳健的价格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为此他与厉以宁进行了交锋……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2003年底，我被《北京晨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财经名流之一。2003年12月17日该报评论说：“他是去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年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把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变成了一个国家未来的生产力。”

2004年3月10日，《中国信息报》在“改革之星”版发表吴志菲写的《张卓元：亲历重大决策的出台》一文，分三个标题：参与起草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解读中国战略白皮书，经济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

2006年12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李功豪著《叩问名师——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评传2》一书中，有一章介绍我的经济学观点，标题是《经济学界的常青树——经济学家张卓元》，目录含《名传京城数十载，却知原是岭南人》《价值规律解说者，大师助手做雄文》《“稳健”“激进”两对阵，“通胀”“价格”启纷争》《中央文件起草者，决策智囊大红人》《解读规划“十一五”，科学发展出高论》，张卓元部分学术成果述要。

2008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记者张煜柠写的《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一文，介绍了2008年9月27日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和经济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六位经济学家（张卓元、陆学艺、肖灼基、赵人伟、朱铁臻、方恭温）七五华诞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刘学敏教授对张卓元学术思想评介摘要：“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是一个学术上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翻越过一个个在别人看来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他



以敏锐的战略目光审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理论难题。他虽年逾七旬，却仍然用犀利的笔锋剖析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他始终站在经济理论的最前沿。”



作者档案

ZUOZHE DANGAN

作者简历

主要著作



经济理论研究

- 003 价格理论突破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改革前进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 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02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靠深化改革立论
- 03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发展
- 037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
- 040 加强经济理论创新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042 孙冶方经济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
——纪念孙冶方百年诞辰
- 04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 056 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
- 060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066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
- 069 经济发展要有新思路
- 075 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084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 090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099 用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制约盲目攀比GDP行为
- 101 节能减排是硬约束
- 107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

- 117 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
12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体回顾与展望
137 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若干规律
147 加快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
152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几点看法
155 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157 集中各方智慧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
——忆 1987 年国家体改委组织八家单位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
162 回顾经济改革 30 年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168 所有制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大胆探索
184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205 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213 在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践中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国有企业改革

- 221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难点和途径
227 国有中央企业需加快改革步伐
230 产权有序流动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234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点看法
238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30 年：重大进展、基本经验和攻坚展望

价格改革

- 262 价格改革规律性探索
272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向何处去
284 新世纪初深化价格改革的设想
288 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90 中国价格改革 30 年：成效、历程与展望

- 305 | 后记



经济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突破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改革前进^①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

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实践又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我国十年价格改革的实践证明，在理论上、思想上、观念上突破传统框框的束缚，逐步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价格理论和思想观念，对价格改革实践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价格改革的丰富实践，也为新的价格理论的形成、价格改革客观规律性的探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和论据。这是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的生动表现。本文拟着重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价格理论突破对价格改革实践的推动作用，并对价格改革的某些规律性进行探索。

一、必须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价格应由政府制定，排斥市场因素的渗入，不考虑供求关系的作用。由于社会上产品数以万计十万计，而各种产品的社会劳动消耗和供求关系是经常变化的，政府不可能对众多产品的价格进行及时合理的调整，结果使价格结构畸形，比价差价不合理，价格关系呈扭曲状态。国际经验表明：价格是否扭曲，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价格扭曲对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价格关系比较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增长。有鉴于此，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肯定，价格本来产生于商品交换和市场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应该让价格恢复其真面目，在市场交换中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产品价格灵活地反映社会劳动消耗和供求关系的变化，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均衡点，从而使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使价格结构、比价和差价趋于合理，为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比较准确的信号，以利于优化

^① 原载《财贸经济》，1989年第1期。



资源配置，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

与此相适应，应当更明确地肯定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著名论点，恢复马克思在论述另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关于供求关系（我体会指长期和稳定的供求关系）制约价值的形成和决定，而不只是制约价值的实现的重要观点。西方经济学中有关边际生产率、机会成本等概念，对分析社会主义价格运动是有用的；对于均衡价格理论，虽然其理论说明含有许多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对商品经济中价格现象的描述不无道理，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我国价格改革的实践得到上述理论进展的巨大支持，并且越来越明确地沿着放开价格、让价格在市场中形成的方向前进。目前，我国有 50% 的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其中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的比例大一些，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放开的比例小一些。还有 50% 的商品，包括粮、棉、油等农产品和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由国家控制，需要随着条件的具备，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步放开。应当承认，十年来我国价格改革的步子迈得相当大，放开价格的速度也很快，并且带来了举世公认的效果：整个流通领域搞活了，市场一片繁荣，社会生产能够比较好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整个国民经济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传统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其价格体制则是行政定价体制，即单一的计划价格体制。这种体制的根本特性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全社会资源实现紧迫的战略任务，但随着社会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生产目标从单纯的数量增长到还要兼及质量提高、生活改善、环境治理等的转变，传统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特别不适应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缩短同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因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浪潮，遍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质在于：扩大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我国，则是进一步确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与此相适应，各方面都逐步接受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即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制定，其他大量商品的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

应当看到，上述认识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经历了近十年的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经济理论界只有少数人赞同市场价格模式。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加上改革实践的推动，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才逐渐肯定市场价格模式和体制。而理论认识的飞跃，又有力地促进了 1984 年以来以放开价格为主的价格改革的进程，并使公众也逐渐明确我国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向市场定价体制过渡。

把市场定价体制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助于人们正确估价理论价格和计算价格的作用和局限性。改革初期，为了寻找改善原来不合理的价格结构的参照系，以便使价格的调整和改革有比较充分的根据，理论界曾提出测算理论价格或计算价格问题，有关部门还抽调力量从事实际操作，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理论价格和计算价格有其天生的局限性，即它只能起某种参照作用或影子价格作用，既不可能代替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动，更不可能覆盖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企图用计算价格去规范价格改革，无异于否定市场价格模式，而只在完善原来行政定价体制的框框内打转，并不符合整个改革的根本方向。

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意味着要把全部产品价格放开，统统让市场调节。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将来仍需实行国家定价，正像目前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一般认为，按销售额计算，仍将有 15% ~ 20% 的部分的价格由国家定价或受国家直接管制，放开让市场调节的部分，则占绝大部分，达到 80% ~ 85%。同时，实行市场定价体制更不意味着国家放弃对价格的管理，除上述占 15% ~ 20% 的部分仍将由国家直接管理外，国家还将通过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等手段，对价格进行间接管理，特别是对宏观价格和某些要素价格（如利息、外汇汇率等）进行管理，目的在于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或相对稳定。这也属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模式中国家调节市场的重要内容。

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过渡的。由于采取渐进的发展方式，就出现了一些中间过渡形式。这其中，除双轨制价格留待后面专门论述外，比较重要的包括浮动价、最高限价、最低限价等形式。1979 年 8 月 1 日起对电子元件实行的浮动价格形式，曾经取得过良好的效果。看来，对一部分供求大体平衡或价格的供给与需求弹性大的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形式，容易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迄今为止，实行最高限价或最低保护价形式的，在许多场合效果不好。实行最高限价者，往往一限东西就没有了，或转入黑市交易或实物串换。而实行最低保护价者，则往往因流通部门没有足够的资金或仓储设备，不能够兑现收购产品。这说明，如果没有必要的平抑市场的资金和物资，国家发布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在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灵活而恰当地运用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这三种主要价格形式，合理控制它们所占比重的升降变化，是一项重要的改革艺术。

三、价格从核算工具转变为最重要的调节手段

传统的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严重贬低了价格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成为单纯的经济核算工具，而同人们的经济利害脱节。在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内部，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并不是那么关心产品价格的高低和交换条件的好坏，因为那时实行统收支制度，企业职工的收入同企业经济效益完全脱钩。这也是造成不同产品价格畸高畸低，价格体系不合理而且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不存在要求改善价格结构，扭转价格扭曲状态的压力和内在机制。这时，价格只是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起不到调节资源分配、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调节生产，正是传统体制下价格不能充当经济调节手段的理论说明。

与此同时，在处理国家与集体经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关系方面，价格的分配职能则被滥用。为了高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常常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得很低，保留甚至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便从农业部门和农民手里得到更多的积累资金，用于建设重工业，结果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苏联长期流行的所谓没有价格同价值的背离就没有价格政策的观点，就是为这种剥夺农民的做法作理论辩护的。

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经济的确认，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也起调节作用。相应的，价格就不只是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而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产品价格高低，利润大小，越来越成为生产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随着对价值规律作用的重视，那种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人为地使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主观主义的价格政策，也受到有力的冲击。在理论上，则提出要弱化价格的分配职能，真正贯彻等价交换原则，更好地协调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价格职能的重大转变，说明价格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大大提高了。这种状况，有助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和市场机制的强化。在实际生活中，价格已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指示器，农民生产和出售什么农副产品，企业生产和经营什么产品，消费者购买什么商品，都首先考虑价格行情，从中作出决



断。这正是商品经济意识。而商品经济意识的提高，必然使社会经济关系越来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的旋涡，加速社会经济商品化的进程。

四、价格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关键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个人乃至地方、部门经济利益的独立性日益明显，利益主体呈多元化格局。这时，原来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不能成为评价各项经济活动效果的准则，对价格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日益突出。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样就把价格改革的意义和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使人们在改革实践中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放开价格以形成新的价格模式的措施。

需要指出，上述认识是有曲折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才逐渐被接受的。例如，1986年，鉴于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紧张，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失衡都比较严重，物价上涨压力比较大，因而深化价格改革难度比较大，有的同志就对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表示怀疑；有人还建议绕开价格改革，或把价格改革放在后期处理，全力推进企业改革。原来拟议中的价格改革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改革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大家清楚地认识到：价格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首先要过而又最难过的关口，价格改革的确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为什么中国经过十年改革后，价格改革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当其冲的课题呢？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迅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特别尊重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价格及其运动实现的。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正是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商品经济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有的同志一方面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强调市场调节，主张凡是市场能办的事政府不必去干预；另一方面却又企图避开或推迟价格改革，贬低价格改革的意义，这在理论逻辑上是矛盾的。

第二，企业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企业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近两年价格改革和市场发育滞后对深化企业改革已产生消极影响。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把企业推向市场，在市场这个竞争的舞台上比高低。这本身也要求有比较规范和合理地评价企业经济活动效果



的标准，即要求有比较合理的价格结构，因此需要加快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对自己生产或经营的产品的定价权和调价权，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不可少的一项权利，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要通过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转换价格模式来实现。

第三，优化资源配置与改善消费结构的需要。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果，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节约社会劳动。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配置和消费结构是由市场导向的，因而要靠摆准价格信号来改善和优化。不合理的价格结构，等于给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一套错误的信号，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滥用浪费，使长线产业缩不短，短线产业拉不长。改革已 10 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继续下去。为此需要加快推进价格改革，使市场导向有助于改善我国的生产和消费结构。

第四，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需要。改革发展到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商品经济秩序最重要的是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等价交换，反对垄断和封锁，排除非市场力量的干扰。这就要求政府尽可能放弃对具体产品和劳务价格的不必要的干预和管制，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去形成，使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即从根本上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的过渡。所以，深化价格改革，正是健全市场规则，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理论的进展有力地推动着改革的实践。价格改革又一次作为最重要改革排入深化改革计划。1988 年 9 月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还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对今后五年及更长时间的价格改革作了战略部署。人们有理由期望经过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能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深化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使新体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将迈出重要的决定性一步。

五、“一调二放三挂钩”——价格改革前进的三部曲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改革已经 10 年。改革初期难以避免的撞击反射式前进的阶段已经过去。改革的深化要求有更坚实的理论指导，要求更好地总结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寻找其客观规律性，以增加改革的自觉性，避免只是应付眼前事变而缺乏战略眼光。而价格改革理论的进展，价格改革规律性的把握，将使我国今后价格改革的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减少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从而充分显示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在这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价格改革是采取一揽子转轨的方式还是逐步推进的方式？如果是渐进式的发展，那么是否可以大致勾画出几个大的不同阶段？目前，理论研究和实际做法都倾向于我国价格改革应采取逐步推进的方针。国内外价格专家还提出：价格改革一般将经历调整价格、放开价格、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三个阶段。调整价格在于初步理顺比价差价关系，使各行各业都能得到大体相同的利润水平；放开价格在于使价格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为什么改革价格体系要采取先调后放的方针？这是因为，解决原来价格体系严重扭曲问题（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初级产品价格偏低、房租和服务收费偏低、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等），最好先采取有计划调整的办法，初步理顺价格关系，然后再在较大的范围内放开价格，以便使价格变动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对人们利益关系的影响不致太快太大。如果不是这样，一开始就大量放开价格，原来偏低的产品的价格就会一次到位，上涨较多，使生产和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与部门骤然得到许多利益；原来偏高的产品的价格则会不动、上涨较少甚至有所下降，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和部门的经济利益就会相对减少，从而造成利益关系的大变动。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改革中如果发生利益关系的大变动，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

采取先调后放的办法，还可以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比较有效地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幅度，不至于使物价总水平失去控制，上涨过猛。因为调整价格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及连锁反应程度，是可以测算和控制的，而同放开价格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的较大幅度上涨与连锁反应较大有所不同。例如，1979年我国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提价幅度22%多），大幅度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价格（提价幅度30%多），只影响1980年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在1%~3%之间。与此不同，1985年放开农副产品对以后物价上涨发生重大影响。1986年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6%，其中因上一年涨价翘尾巴因素就占3%。1987年政府调价引起的零售物价上涨率不到2%，而全年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率达7.3%。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1988年物价上涨幅度更大，达16%以上。所以，如果先初步理顺了价格关系，价格扭曲程度有所缓解，然后再放开价格，就可能不会带来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连锁反应也会小一些，从而有利于价格改革的稳步推进。

放开价格是价格改革的方向，要逐步创造条件使除少数最重要的或垄断性产品和劳务价格外，统统放开价格。放开价格也要逐步进行，一次全部放开价格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么做不到，要么风险太大，造成社会震荡过于猛烈。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那些需要放开价格的产品，其供求关系变化，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是不相同的。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给、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的价格，可以较快放开；而供求矛盾尖锐或供给、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的价格，就要放得慢一点。还有，在我看来，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生产资料价格则要迟放少放一些。这样既有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平等竞争，又能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这种思路同管住上游产品价格放开下游产品价格的思路是不同的。如果上游产品较多地实行国家定价，而下游产品则实行市场调节价，那么，就很难解决原材料价格或工业初级产品价格偏低而加工产品价格偏高的问题，或者会使原来不合理的比价复归。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定价往往是偏低的，或者因受国家管制或干预而使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同价格放开的下游产品即加工产品的价格相比显得偏低。只有同样实行基本放开价格的方针，才有助于理顺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

从长远看，我国价格要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以利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从近中期看，则只能少数和部分产品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以免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过大；同时，由于技术、管理水平都不高，加工工业消耗较大，为了提高本国的加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国内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可考虑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10年来，我国价格改革的步伐，总的来看并不算慢，可以说是比较快的，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尤以1984年以前调整价格的成绩更为显著。1984年以后，由于发生通货膨胀，放开价格带来物价总水平的较大幅度上涨，因而影响了放开价格的成效，并且严重影响了价格放开的步伐。即使如此，放开价格的成效也是相当显著的。一些价格的供求弹性比较大的产品，如鲜鱼、水果、花生米、服装等，价格放开后，虽有所上涨，但供给增加较快，市场比较稳定和繁荣，受到广大居民的好评。

六、双轨制价格的风波

在价格改革实践和价格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双轨制价格问题，有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非难颇多。有的经济学家则一直持肯定态度，认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双轨制价格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在前一段作用可能利大于弊，而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双轨价差不但没有逐渐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因而逐渐暴露和突出其弊端，到现在已呈弊大于利的势头。



同种产品（主要指同种工业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地点上存在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是1984年开始出现的。1984年5月20日，国务院规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占计划内产品的2%）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1985年1月24日，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又通知，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的出厂价格，取消原定的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可按稍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双轨价格就此合法化和公开化了。

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出现，在我国有其客观必然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改革，不是采取突变式一次行动完成的，而是采取渐进式逐步发展完成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要经历十几、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并存的局面。这反映在价格形成上，就是一方面既存在按照原来的机制形成的价格，即国家统一定价，又存在改革过程中按照新的机制——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这两种不同机制形成的价格，不仅表现在不同种类的商品交换中，形成板块分割，而且表现在同种商品的交换中，出现价格双轨的局面。价格双轨制正是集中反映了双重经济体制特别是双重计划体制和物资体制并存的态势。

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国城市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国家规定计划内产品中有一部分（一般企业占2%）允许企业自销，超计划产品也允许企业自销。既然允许企业自销一部分产品，就应当允许企业对这部分产品有定价权，同买主进行协商定价，从而形成计划外价格。

由此可见，双轨制价格在我国出现，合乎改革发展的逻辑，可以成为从行政定价体制向市场定价体制过渡的一种形式，从而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许多论者肯定双轨制价格的积极作用时往往从这一点出发。

这几年实践说明，双轨制价格的利弊都很突出。双轨制价格能刺激紧缺物资的增产，满足计划照顾不到的乡镇工业原材料等的需要，有助于调剂余缺、调节流通，有助于了解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反映正常的比价关系，这是它的利的一面。双轨制价格又常常冲击国家计划，影响供货合同计划的完成，不利于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助长投机倒把、追逐大量流通利润的恶习，不利于经济核算等，这是它的弊的一面。现在看来，如果双轨价差不那么大，例如，计划外价格高出计划价格的幅度在50%以内，双轨制价格的积极作用可能发挥得好一些，



而其消极作用可能不会过于突出。但是，实际上，这两年，价差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由于价差过大，利用双轨制价格从事投机倒把、追逐大量流通利润的活动日趋普遍和严重，甚至成为哄抬物价的重要力量和以权谋私的主要媒介。这样，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变双轨制为市场单轨制，就成为下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

双轨制价格的双轨屏障是很难严密的。计划外价格上涨幅度大，往往拉动计划价格的变相上涨。目前，使用计划分配物资的企业，其价格由于受计划外高价影响，已逐渐变相上涨，一般都要高出国家规定的“本本价格”20%~50%之间。例如，目前钢材国拨价700元/吨，用户实际使用价1100元/吨，市场价1800元/吨，用户实际使用计划钢材价高出计划价50%以上，而市场价则高出计划价160%。正因为计划外价格很高，使得计划价格内的各种形式的地方临时加价五花八门。以钢材为例，据我们1987年在湖北省的调查，其计划价格就有国家统一调拨价、地方价、中价（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掌握的非计划物资的官定价格）、临时价（又分冶金部定临时价、国家物价局定临时价、省市物价局定临时价等多种，实行地方临时价的已占总产量的40%）、优质价、来料加工价（物资部门使用的）、进口代理价、协作价等十几种。其中地方价（加上手续费）一般比计划“本本价格”高出50%以上。

看来，对价格双轨制，我们既不能估价过高，如像1985年“巴山轮”讨论时有的外国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是什么“发明创造”，“可以使行政的直接控制平衡地过渡到通过市场进行间接控制”；也不能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有百害而无一利。它是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发展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过渡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化，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并轨，向市场单轨制过渡。这样的理论认识，也许有助于价格改革的推进。

七、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于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物价水平

价格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原理：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于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物价水平。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价格改革就能顺利发展；处理不好，价格改革就很难向前迈步，再好的方案也无法出台，甚至有可能重新强化行政干预。

在传统体制下，由于严格的行政管制，农产品价格、初级工业产品价格和一些服务收费长期被压得很低。改革价格体系，就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上述偏低



的价格，而原来偏高的产品价格是不容易降下来的。这样，在理顺价格关系过程中，物价总水平一定幅度的上涨是必然的。因此，进行价格改革，要打破传统的稳定物价即冻结物价、物价总水平越是原封不动越好的观念，逐步树立商品市场经济价格经常变动、价格总水平一般会有所上升的新观念。

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如果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只限于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结构，那么其上涨率不会太高，估计一般在 5% 的幅度内。而由于物价改革是分阶段经历十年八年实施的，这样分解下来，年物价上涨率可以控制在 3% ~ 4% 之间，也就是说，还能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即可以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条件下理顺价格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实际发展常常超出这一理想模式，出现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过大的情况，从而增加了价格改革的难度。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如下几种情况的存在，常常导致需求过旺和通货膨胀。

1. 经济发展“快了还要更快”的数量驱动和扩张冲动，还普遍存在，形势稍趋好转便会走向“过热”。特别是宏观指导思想如果有追求高速度的片面倾向，就容易推行用多发货币来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2. 改革放权，使地方、企业有了归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形成了新的膨胀主体。预算外投资已经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主力，工资基金、津贴以及社会集团购买力也由此而难以控制，不断猛增。3. 结构失衡和总量膨胀互为因果，循环推动。当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新的投资主体之后，利润高低就对投资决策起引导作用，在价格扭曲尚未理顺的条件下，必然把投资引向价高利大的“短平快”项目和加工工业部门，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品和服务则更加短缺，中央政府被迫采取多发票子等办法，把更大规模的投资用于“瓶颈”部门，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加剧总量膨胀。4. 传统的宏观调节手段已经弱化而新的调节手段尚未形成，也增加了总量控制的难度，使得总量膨胀不但容易萌生，而且难以控制。近几年每年拟定的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指标，都被突破。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其幅度 1984 年以来每年在 11% ~ 16% 之间；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过量发行，1984 年以来货币供应增加率每年都超出经济增长率（以国民收入增长率为代表）10% 以上，就导致了 1984 年以来，一方面经济长期过热，工业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伴随着结构矛盾加剧，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5 ~ 1987 年，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均上升 7.3%，如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则达到两位数（10% 左右），1988 年，物价总水平以更大幅度上升，达 16% 以上。

如果说，1984 年以前，我国价格改革过程中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主要是由



于对原来不合理的价格结构进行调整引起的，即主要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那么，1984年以后，我国的物价上涨，除了继续包含结构性物价上涨因素外，已经越来越主要由通货膨胀所引起，并且表现为需求拉动型物价上涨，还夹杂一部分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引发的工资成本上升，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成本上升）。总之，1984年以来，由于发生通货膨胀，并且呈发展趋势，使原来顺利发展的价格改革受到干扰，使结构性的价格调整和改革变成物价的普遍上涨。这样，1. 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问题突出起来，粮价又一次像1979年那样成为整个价格体系的“谷底”。2. 近两年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率已不低于甚至高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率，初级产品价格偏低问题远未解决和逐渐突出。原来我们预计，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合理的价格结构进行调整，可能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约50%，然而从1979年到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已上升45.7%，但是目前价格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改革的任务仍然很繁重。

物价的持续过高上涨会对人们产生心理压力，使企业和单位不是致力于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效益，而是致力于囤积居奇，投机倒卖，竞相提价，以及利用垄断和特权地位追逐大量流通利润等活动，使公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挫伤群众储蓄的积极性，导致出现抢购物资，冲击市场等情况。这种情况，只能使价格关系混乱，甚至使已初步理顺了的价格关系重新扭曲，即比价复归。物价上涨过猛，也影响价格改革的深化，使原定的改革方案难以出台，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

现在，各方面已倾向于认为：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要理顺价格关系；另一方面在理顺过程中物价上涨幅度不能过大，要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以利于经济的稳定和社会安定。而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矛盾就会尖锐化，甚至难以解决。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深化价格改革，要尽可能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而如果已出现通货膨胀，则要治理它，特别是要抑制它的发展势头，彻底摒弃通货膨胀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这也许是十年价格改革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教训。

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诸如价格与财政的矛盾，物价与工资的矛盾，国内价格水平与人民币外汇价的矛盾，价格双轨制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在不出现通货膨胀时，都比较好解决。但是，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形成“物价—补贴—税



收”的怪圈，出现物价与工资轮番上涨，国内价格水平上涨同人民币汇价下跌的恶性循环，以及双轨制价差拉大等一系列问题。

显然，上述价格改革难点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必将增强我国今后价格改革的自觉性，有助于为顺利推进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价格改革更加健康发展。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88年10月1日发表的公报指出：“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为了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一定要抓出成效。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务必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明年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可以预期，按照上述已确定的方针，我国价格改革将在新的发展阶段胜利前进，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价格模式的转换，并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八、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广义价格改革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排斥广义价格概念，因为这种理论不承认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商品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利息率、工资、地价和地租都要由国家制定和调整。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提出了战略性价格的概念，即把生产要素价格归结为战略性价格^①。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生产要素被确认要逐渐商品化和进入市场，显露其价格，广义价格及其改革的概念被提出来并开始得到广泛的重视。近两三年，这方面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改革的实践方面，1979年以来，我国价格改革，已经历如下两个阶段：1984年以前以调整各种产品（和劳务）价格为主的阶段，1984～1988年以放开各种产品（和劳务）价格为主的阶段。前十年可以归结为主要从事狭义的价格调整与改革。从1989年起，我国价格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

^① “有三种价格是战略性的，一是资本的价格，即利率；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三是外汇的价格，即汇率。国家要对这三个市场的运转加以控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6月，第50页）



物价、工资、利率联动的广义价格的调整与改革。只有跨越这一阶段，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取向的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现阶段以物价、工资、利率联动（其中以物价改革为主，工资和利率的调整与改革配合）为特征的广义价格改革，是合乎价格改革进程逻辑的发展。

发展还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是新旧体制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扩展商品货币关系方面，我们已两次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第一次为20世纪70年代末，肯定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第二次为1984年以后，肯定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的商品化或具有商品形式，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随着商品关系范围的扩大，不仅生产资料要进入市场，生产要素也要进入市场，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使依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成为现实的经济过程。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在苏东各国前面的集中表现。不说苏联，就是南、匈各国，都未提出发展资金市场问题，更谈不上建立包括商品（劳务）、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外汇等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问题。

商品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开拓了人们关于价格改革的视野。价格改革不只是包括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体系与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且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体系与形成机制的改革，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广义价格改革。广义的价格改革过程同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的统一，同市场机制的整体功能的发挥的统一，是这一时期价格改革的显著特点。如果说，1986年拟订价格改革方案时着重于价税财联动，那么，1988年拟订价格改革方案时，进一步发展为物价、工资、利率联动，是合乎改革逻辑的。这正好标志着改革向深层发展和人们对改革认识的深化。

1985年以来，我国出现中度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工资、利率联动更为必要和迫切。在通货膨胀袭击下，出现了原来不合理的比价复归，而改革的深化却要求进一步理顺产品和劳务价格关系。由于1985年以来年物价（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达到两位数，靠固定工资收入为生的公教人员等的生活补偿问题日益尖锐；许多企业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又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如何约束工资性收入（或消费基金）膨胀成为现实经济生活的难题。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拉大了物价上涨率与平均利息率的差距，挫伤了居民储蓄的积极性，刺激了对货币资金的过度需求，不仅加重了资金供求矛盾，而且形成对市场冲击的潜在和现实力量。因此，当前要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必须是物价、工资、利率、汇率等联动，对物价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而引起的物价



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要通过增加工资或补贴给予补偿，要提高利息率使实际利息率是正数而不是负数。

为使联动有条不紊地进行，考虑到物价改革已进行多年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而工资、利率改革刚刚起步，保证宏观经济变动的可控性，目前物价改革可实行放调结合以放为主，而工资和利率改革则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走市场化道路。但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因此工资远未具备由市场竞争形成的条件。目前，工资配合物价改革，主要内容还只能是考虑在物价改革过程中物价上涨不可避免，因而工资改革首先要解决补偿问题，兼顾改善结构，保证职工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下降。补偿的形式可采取定额补助，必要时短期内实行工资指数化，还要对刺激失当的工资管理办法进行清理，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工资的竞争和约束机制前，不能放弃工资的总量控制。当前在工资分配中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普遍偏低，既应看到国家目前尚无力量进行全面的结构性工资改革，也应当恢复定期升级制度，纠正1985年后再度停止定期升级的不当做法。

要配合物价改革，提高利率，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国际经验表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最重要工具，提高利率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要边治理经济环境边深化改革，必须自觉地启动利率杠杆，物价、工资、利率联动。首先将存贷款利率提高到实际物价上涨率水平，进而提高到预期物价上涨率水平，以保证实际利率为正数，其正数值可考虑在2%~4%幅度内，从而稳定存款，稳定经济。要经过几年的努力，随着资金市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才能做到利息率由资金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目前则仍以国家有计划调节为主。

此外，要尽快实施城市地产有偿使用并允许转让出售。土地级差收益主要上交国家财政。一切土地转变用途都要重新定租。与土地的使用相仿，一切矿产资源、水源、林地的开发使用要缴租纳税。

人民币的汇率现阶段仍以国家调整为主。汇率的市场调节，包括取消双重汇率，恐怕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实现。

可以预期，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广义价格改革，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共同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改革潮流，促进“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使社会经济生活逐步转移到新的体制上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①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异常活跃，成果累累，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科学的繁荣。伴随着全国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一批又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经济理论报刊迅速增加，经济理论研究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一、近二十年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引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在这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统治了中外半个多世纪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定，社会主义是同商品货币关系相排斥的，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建立和运行的，但是，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缺乏生机和活力，不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不能很好地持续地提高效率，从而逐步拉大了同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这就很自然地引起经济学家们思考，是不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性的认识有不够全面之处？

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充分而合理地配置现有的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过去人们常以为，用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但是，且不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生产的程度，更为现实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

^① 原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发展，科技革命浪潮一个接着一个，生产技术日新月异，产品种类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日益复杂与多变，使得运用计划手段无法做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消费）的有效连接，必然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和严重浪费。迄今为止的经济实践和经济资料都表明，市场调节依然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在范围广泛的竞争性部门，市场机制自动引导着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那些自然垄断部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部门，一旦在适用范围内引入市场机制，其效率也能明显提高。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根源正在于此。

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点和优点，是在保留和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转向市场经济，即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下转向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要点有三：一是公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重要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三是有的地区、有的行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制为主体，能有效防止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两极分化，走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道路。需要指出，为了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要对传统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真正确立。正因为如此，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人、经济官员和经济学家，将成功地发掘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很好结合的道路。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的提出和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与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1978年以来，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一直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广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增强了市场的活力与生机，经济增长加速，物资丰富多彩，市场一片繁荣，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96年增长了4.45倍，平均年增长9.8%，处于世界前列。1996年，我国人均GDP，按当年汇率计算，已达到680美元。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1亿元人民币，1996年末，则达3.8万亿元以上，增幅惊人。到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将普遍达到小康水平。可见，正确的理论，可以变为多么大的物质力量！

说到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贡献，不能不提到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



同志高度评价当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没有出现大的曲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能够成为经济论坛的主流，并且迅速深入人心，同邓小平同志带头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积极倡导、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二，通过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长期在幻想中漫游回到现实中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① 怎样在中国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常碰到需要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搞了许多超越阶段的过急做法，走了不少弯路。这当中，无论是实行“一大二公”，搞所有制升级，还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一次又一次超越阶段急躁冒进行动带来的严重损失，使大家重新冷静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究竟处在什么发展阶段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的论点，并且产生重大社会影响。1981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的路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涵是，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期间要经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百年时间。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根据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 1980 年对中国的考察报告，1952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合 50 美元，比印度还低，只相当于苏联 1928 年人均 240 美元的 $1/5$ 多一点^①。即使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这种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90 年代初，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 400 美元左右，仍处于全世界的后列。至今 12 亿人口，仍然有 9 亿人在农村。农业仍然以手工劳动为主，没有改变靠天吃饭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市场关系比较发达的城市，同落后的农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存在；少量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 $1/4$ 的状况同时存在。这些都说明我国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1996 年，农村还有 5800 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城市也有近 2000 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尽管近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一般预计，中国要基本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用两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还需要 21 世纪上半叶的努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经济的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向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使我们对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为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有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应当长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走私有化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我国又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远未达到可以实现全面公有化的程度，而必须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② 的非公有经济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允许

^① 世界银行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982 年 3 月），中国财经出版社，1983 年中文版，第 26 页。

^② “三个有利于”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2 页。



非公有制包括个体、私营、外商独资经济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下发展，以便动员更多的资金和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生产更多的产品满足社会多方面需要，推进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十八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其中一半以上是由非国有经济包括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贡献的。其中，非国有经济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1990 年至 1995 年分别为 62.2%、56.3%、67.5%、68.7%、85.6%、76.9%。^① 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所作的政策调整是十分正确的，今后仍应长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既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要着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提高市场化程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社会经济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才能走向现代化。企图越过商品化、市场化，实现现代化，没有一个能成功。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下，各个经济活动主体竞相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从而使经济活跃起来，走向繁荣昌盛。当然，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某些干预，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市场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力争再经过 5~10 年的努力，使我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从目前的 50% 左右提高到 60% 以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

既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就要十分重视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过渡。我国目前人均 GDP 已达 600 美元以上，国际经验表明，人均 GDP 从 600 美元到 3000 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我们要认识这一客观经济规律，自觉地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中心是实现工业化，改变长期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状态。当前世界正处于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国际经济竞争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技术竞争。我国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时，应清醒地看到这一点，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升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级，逐步使自己跻身于现代化的行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研究最重要、最突出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支柱。现阶段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研究，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要以这两大理论为依据、为指导。这两大理论的发现和论证，是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

第三，研究方法有重大改进，表现在更加紧密地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注意吸收当代经济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理论研究普遍地走出科学的殿堂，广泛参与和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开展，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提供咨询意见，许多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与论证，参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又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材料。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是全世界经济学家都很感兴趣的新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正在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对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努力寻找这一领域的客观规律性。

经济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各种应用经济学得到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也是实践的需要和市场的巨大需求。应用经济学的主要学科，包括国民经济管理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都有很大的发展，论著甚丰，学者日众。还有各种经济管理学科，包括工商管理（内含会计学、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内含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也成为研究和学习的热门，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志于经济学研究和学习者。

经济理论研究离不开统计资料和数量分析。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数据的文章，很难成为经济科学论文。过去，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比较注重对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下意识形态味道过浓，对数量分析不够重视。虽然也有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同志，呼吁加强数量分析，经济院校学生要学高等数学和善于处理数据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收效甚微。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不仅重视生产关系问题的研究，而且重视生产力问题和具体经济问题（包括政策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有充分的数据支持自己的结论或政策建议。在这



种情况下，经济计量学迅速发展，对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的文章和运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学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们对经济学是不是一门比较精密的科学的怀疑。

实证研究的流行也是近二十年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经济理论研究既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过去，我国经济学论著不少属于概念之争和政策注释，因而偏重于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这显然影响我们对未知的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和认识，影响经济研究的创造性思维。实证分析主要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进行客观的如实的描绘，而不对其作价值判断，也不必提出必须如何、要求怎样等说教。实证分析特别是其中的案例分析，类似于毛主席倡导的“解剖麻雀”，有助于经济研究从具体的典型入手，掌握信息，寻找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共同的东西，使理论研究不至于脱离实际，违背认识的规律。这些年来，许多经济学博士论文，都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案例研究也不仅见之于实证分析的论著中，而且出版了专门的案例研究论著，在理论界产生了好的影响。

充分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呈现新的活力。科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①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文明成果而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吸收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方面，有许多成果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这些年来，我们引进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实践证明是有益的。许多概念我们已经常用，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机会成本、比较成本、全要素生产率、影子价格、生产函数、消费者主权、交易成本、有效竞争、规模经济、经济外在性、市场失效、政府失效、帕累托最优、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金融深化、期权、互换、第一、二、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内部人控制、市场风险、金融风险、寻租、公司治理结构等。有些经济理论学说，也被借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它们中有：产业组织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成本效益分析理论、制度（体制）效率理论、现代公司理论、厂商理论、短缺经济论、分权模式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虽然在引进当代经济学概念和原理中，存在一些生搬硬套的问题，但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版，第441页。



总的来说，成效是显著的，大部分能为我所用，目的就在于努力使这种吸收用来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经济科学，增强它的科学性、适用性，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需要强调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展，远远不止上面列举的这些，还有许多重要内容，因限于篇幅，这里只好从略了。

二、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景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争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前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含两大方面的转变。一个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是从二元经济结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在这两个转变过程中，将会碰到一系列过去经济学家从未碰到过、从未研究过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用新的原理、概念来补充、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经济学说。

头一个问题，当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市场经济并不只限于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能运行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可以同公有制包括社会主义国有制相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逐步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要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需要改革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中间，最突出的是如何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根据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确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进行公司制改组。除极少数生产特殊产品或提供特殊服务的企业可以由国家独资外，一般都要求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利于政企分开和转换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在这里，出资人和作为法人实体的企业的权责关系是明确的。国家等出资人享有所有者权益，即资本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并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的债务负有限责任。企业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以赢利为目的，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本保值增值责任，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就能改变国有资本无人负责的状况，企



业不再吃国家的大锅饭，也不搞“内部人控制”，损害所有者权益，同时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国家不再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对于大量的国有小企业，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包括租赁、承包、兼并、合资和转为股份合作制或出售等。从各地实践看，转为以劳动者的劳动、资本联合为主带有一定公有性的股份合作制，对大量国有小企业是可行的。我们相信，到20世纪末，我国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能够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可以使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要求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可见，核心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消除。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只占10%甚至更少，与此相对应，农业产值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低。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等收入国家为15%，发达国家为5%以下，而低收入国家则占38%左右。我国农业产值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79年为34%。^①1995年，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达20.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2.9%。今后，至少还有一亿以上农业劳动力要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谈得上结构转换的实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重大和特别突出的问题，有待我们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战略乡镇企业，力图主要用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吸收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近二十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已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3亿个。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为14595亿元，占当年GDP的25.1%；乡镇工业企业增加值为1.0804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2.4354万亿元的44.4%。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新的增长点。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结构转换，这是别的现代化国家没有先例的。中国正在探索的是一条新的路子，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开创意义。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经济在稳定中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碰到的新问题。大家知道，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很好实现的。邓小平同志估计，中国要建立比较定型的新体制，大约要到2020年。即使2020年后，由于技术进步加快，经济生活节奏加快，各国经济联系和融合的趋势加强，新体制仍需不断调整和改革。因此在一个较长时

^① 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报告），第88页。



期内，我们都面临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问题。从中国已有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要求以改革和发展促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使三者很好结合，有机统一。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经济中，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我国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没有出现某些经济转轨国家那样的经济和生产大幅度下降，成百上千那样高的通货膨胀率，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另一些经济起飞国家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外债的痛苦过程。相反，我国在市场化改革取得一步又一步实质性进展的同时，经济发展很快，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创造了中国的奇迹，虽然受到过中位以上通货膨胀的袭击，但时间不长，通货膨胀率也不是很高，总的说来没有破坏经济的稳定。改革开放十八年来，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年均上涨率为7.66%，属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经验，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年均8%~9%不超过10%为宜，着重注意不要连续几年经济发展速度超过10%。因为我国在一段时间（至少十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还是外延型粗放型的，高产出主要靠高投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的迅速增长来支撑。经验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超过10%，特别是连年超过10%，必然伴随着投资过热和货币供应的过量增长，从而引发中位以上通货膨胀和带来10%以上的物价上涨率，而两位数以上的物价上涨率是公众不能接受的，是会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当然，我们在转轨时期，也不能要求物价上涨率为零或很低（如2%~3%），因为这不利于价格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可能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之，寻找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较佳结合点（当前似乎以8%~10%的经济增长率和5%~7%的物价上涨率为较佳结合点），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以上所列三个问题，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还有许多重要问题，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的贡献和面临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有六个研究所，即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有研



究人员几百人。二十年来，在院所领导下，在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许涤新、骆耕漠、严中平、刘明夫等言传身教下，勤勤恳恳，艰苦探索，许多学科都颇有建树。囿于见闻，以下仅就基本经济理论方面，简述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的贡献和面临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自 1978 年以来对基本经济理论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孙冶方继续就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包括：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改革；要为市场需要生产，不能为仓库生产；必须纠正国有企业折旧基金上缴财政的“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管理制度；认为依靠科技进步，“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二十年翻两番的发展战略目标肯定能实现（实际上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张），等等。这些意见，受到中央重视与采纳。

2. 一些经济学家（如马洪、于光远、刘国光、孙尚清、刘明夫）在改革初期，在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保留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企业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蒋一苇还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等等。有的经济学家，较早从理论上肯定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解除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方面，起着先导作用。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多次接受中央任务，就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见解。1987 年公开提出中国改革和发展要“稳中求进”的思路，着力抓改革促稳定与发展，改革方面要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双线推进，坚决反对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大本营。

4. 既一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又反对“一步到位”，主张积极稳妥的渐进式改革，致力于使经济体制转轨，进入良性循环。既要充分吸收当代经济学的有用成果和外国成功经验，又反对照搬外国模式，而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对转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价格改革、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对外开放、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等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力图作出理论概括。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社科院专家正式建议海南省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 出版了一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精品，如严中平、汪敬虞等撰写



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许涤新、吴承明等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明确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连续发表文章多方面阐述如何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这种敢闯的理论勇气是值得称道的，对推动经济学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经济学家从1990年11月起，每年两次（春季与秋季）同国家统计局等专家一起，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并从1991年起，每年出版一本经济蓝皮书，对上年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进行分析，对新一年经济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以及提出若干对策与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工作，由于有较高质量，受到各方面重视，社会影响大，国内外许多机构和经济学家都把该书作为了解中国经济信息的权威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的一批学术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

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进入起飞阶段，也是经济结构急剧变动的阶段。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重要时刻，我们面临着要在21世纪中叶完成工业化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这当中，前15年最为重要。我们既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加速、国际经济竞争日趋剧烈的强大压力与挑战，又存在经济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机遇。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经济搞上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在这样难得的机遇面前，我们经济学界，要更好地跟上时代步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寻找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科学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靠深化改革立论^①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和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理论

^① 原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



创新的主要结晶。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中国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创举最具典型意义，其规律的适用性较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间不长，至今也只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成比较完善和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一二十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努力。我们现在提出和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只是初步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的，国内外也还有些经济学家怀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真正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科学理论还未最终确立。这一创新理论要真正广泛地令人信服，作为重大的成果进入经济科学宝库，还要靠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大胆实验、勇于探索，并对改革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揭示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性。现在看来，至少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探索。

第一，寻找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原来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国有制不能同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这已被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行股份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旨在积极吸收非国有投资主体参加国企改革，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退居股东地位，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此举并不成功。主要是不少转制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绝对控股，等于行政性的翻牌公司，行政干预仍很厉害。所以，不能说国有制采取了股份制形式就等于找到了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形式。上海广电集团提供的经验值得重视。这个集团虽然是国有制绝对控股，但是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分别持股，而且股权比较均衡，不能一家说了算。这种股权结构使集团同原来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一道“隔火墙”，较好地实现了政企分开。也许这样的股份制，可以作为少数需要保留国家绝对控股的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而更多的股份制企业，则应是包括非国有、非公有制的多元化投资主体，尽可能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国家要控股的也可以多采取相对控股的结构。这样做也是适应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其在经济总量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客观实际。

现在国家对几十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授权经营国有资本，但这样做，所有者还是缺位，谈不上找到了与市场经济很好结合的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公司，大体是计委管立项，经贸委管日常运营，企业工委、人事组织部门管干部任命，财政部管财产登记包括收益。这几个部门都可以说自己是国有制的代表，都可以干预公司的事务，但如果出了问题，很难找到负责任的。这表明，



国有制主干部分至今仍未找到同市场经济很好结合的实现形式。所以，当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继续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国有经济继续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同时，积极推进国有资产（本）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在于找到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国有资产（本）的管理、运营和监督的有效形式，落实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没有很充分的说服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很难最终确立。

第二，建立开放型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的市场经济。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贸易自由化形成浪潮，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开放型的市场体系，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打破除极少数自然垄断以外的各种垄断和封锁，维护公平竞争。但我国目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各种行政与部门垄断、地区封锁和价格结盟阻挠竞争的有序进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假冒伪劣盛行，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逃废债务到处可见，走私、骗税、骗汇屡禁不止，甚至有些法律法规也同对内对外开放市场的要求相违背，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离建成开放型的市场体系还很远，而开放型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建立起开放型的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才是正常、有效的，也才有条件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较好结合。社会主义从来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讲公平，又要讲效率，实现两者的结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认为是对的，是适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直到2010年）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在一段时间内要强调效率，使经济发展得尽可能快一点。而在经济经过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完善的时候，比如到2010年及以后，我们也许要对社会公平问题引起更高程度的重视，实行效率与公平兼顾、大体同等重视的原则。从我国当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已超过0.4的警戒线的实际情况看，更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给社会的弱势群体予以更多的帮助。比如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还有1/3以上的农村人口，并未完全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指标，农村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城市也有一两千万贫困



人口。今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似乎要让上述群体的生活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改善，以便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我们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为了协调好东、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减缓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进而使其差距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逐步缩小。所以，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行的应是效率与公平大体同等兼顾的原则，以利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统一。中国正在花很大力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费保障等。但是，限于生产力水平和国家财力，我们现在建立的只是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只适用于占总人口数30%多一点的城镇人口，不包括占70%的农村人口。这显然是不够完善的，有待进一步改进。可以想象，在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的不可能是只对少部分人适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应当是包括城乡人口在内的对绝大多数人都适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个保障的标准虽然可以有差别（中国那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差别是无法避免的），但不能差别过大，大体应统一，特别是制度应统一，让老百姓都知道。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也很值得研究和改进。我们过去是“五龙治水”，各部门争权夺利，损失浪费不少，现在加强统一管理，比过去大有改进，但是否还可以吸收外国一些好的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使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得更加有效，特别是能很好地保值增值。还要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公有制的重要形式，其管理和运行要考虑同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这方面，我认为智利的由十多家独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养老金的经验，值得重视。他们由于在基金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入竞争，使得养老基金实现不小幅度的增值，管理得很有效。总之，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任重道远。而只有建立起比较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并找到体现其本质联系的规律。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发展^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认真总结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和

^① 原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极为丰富的经验，充分吸收了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做法，以完善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对今后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原则规定，为我国21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决定》的贯彻和实施，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决定》在不少方面有理论创新，下面仅就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方面谈谈个人学习的体会。

一、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完善新体制

《决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五个统筹”本身是发展问题，但改革是为发展提供动力的，是为发展服务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要着力解决的正是这“五个统筹”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很好解决的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的体制和机制，以便更好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比如，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三农”问题，就要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除了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等以外，还要努力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后者包括：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等等。

又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解决一个时期以来一条腿（经济发展）长、一条腿（社会发展）短的问题，解决一些政府部门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社会事业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年春夏我国出现“非典”疫情时表现得特别突出。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强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既要首先重视经济发展，又要重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再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着力解决越来越受大家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为此，《决定》提出：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资



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必须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统筹区域发展，就要求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等。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更多地按国际惯例办事。总之，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完善新体制的目的就在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一部分，可以归结为，由于发展理论的创新带来改革理论的创新，并证明了改革与发展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企改革理论的新突破

《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论断，是对过去党的文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的继承和重大发展，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新突破，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趋势。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我国国有企业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后，一直积极推进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实行制度创新，使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可以在现代公司制度的财产组织形式中相互渗透和融合，使股份制、混合所有制逐渐成为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全国4371家重点企业，包括514家国家重点企业，181家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



于企业，93家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121家国务院确定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以及3000多家省级重点与试点企业的跟踪统计调查，结果是，截至2001年底，所调查的4371家重点企业中已有3322家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造，改造面为76%。改制企业中非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占改制企业的74%。3322家改制企业注册资本金合计11437亿元，其中，国有资本7383亿元，占64.55%；包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外商资本在内的其他各类资本4054亿元，占35.45%，大多数企业开始实现了产权的多元化。这表明，目前全国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已改为股份制企业，混合所有制已成为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除个体户外，90%以上的新建企业为股份制企业，70%以上的老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正在逐渐减少。

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也呈互相渗透的趋势。1992年，我国上市公司53家，全部是国有控股。到2000年和2001年，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如下表：

项目	2000年公 司数(家)	占比(%)	2001年公 司数(家)	占比(%)
上市公司总数	1086	100	1159	100
无国家持股的公司	347	31.9	294	25.37
其中国家股退出的公司	50	4.6	55	4.75
国家一般参股的公司	111	10.22	121	10.44
国家绝对控股的公司	333	30.67	367	31.67
国家相对控股的公司	295	27.16	377	32.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分析（2001、2002）》推算。

这几年我国实施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革的政策，促进了国有资本和各类非国有资本相互融合，促进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据全国工商联2002年对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分别有8%和13.9%的私营企业已经和准备兼并收购国有企业，有25.7%的私营企业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的。这几年，外资收购和参股国内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逐渐增多。据世界知名咨询公司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公布的报告，1997～2001年，“海外收购国内”的交易共有66项，交易金额为65亿元人民币。2002年以来这项活动进一



步发展。深圳市 2002 年决定和实施向外商出售市属从事公用等业务的优质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其中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25% 的股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45% 的股权，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24% 的股权，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45% 股权，食品总公司转让 70% 股权等。

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和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其政策含义非常重要。一是要更加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积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二是今后要尽量少搞国有独资企业。三是重要的企业需要国有控股的，也要尽可能相对控股，这是规范的股份制和公司制的要求。个别仍需保留国有独资的，也要由多家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持股，使出资主体能互相制约。四是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可向非国有企业参股，但要遵守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公平竞争原则，不能凭借政府力量强令推行。

从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推行股份制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表明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逐步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三、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决定》有一个专题论述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是《决定》的又一重要亮点。《决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重组，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产权问题的重要性，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日益突出。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时，就将产权清晰列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基本特征。构建合理的产权（股权）结构，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是明晰产权，出资人到位，改变产权主体虚置的根本举措。我国集体企业改革，最根本的是产权改革，即明晰产权主体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是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关键。改革发展到今天，要推进深层



次改革，就必须把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作出明确的规定。三中全会这方面的决定，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提出的。

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是相对应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是现代公司制。现代公司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出资人拥有股权，股权可以转让，但拥有股权并不因此可以直接从事公司经营、干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事务。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出资人选聘的经理层负责组织实施的。所以，股权是现代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象征。现代产权还包括一系列的无形财产权，如知识产权、商标、信誉等，而且这部分财产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发展而越来越重要。

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一要明晰产权，二要严格保护产权，三要产权自由流动。明晰产权要明确产权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产权模糊，经济实体就没有发展动力或动力不足，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推进产权改革，在于原来的体制产权不够清晰，影响发展后劲。国有企业由于出资人不到位，出现了种种弊端，因而首先要明晰产权，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产权明晰以后，必须严格保护产权。产权是排他性的，不是公共品。个体、私营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但过去对产权保护不力，随意侵犯产权的现象屡屡发生，挫伤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所以要健全法律法规，对产权予以严格的保护，包括保障各产权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产权还要能够自由流动。产权归属清晰和保护严格后，自然允许其自由流动。产权主体拥有产权，不是为拥有而拥有，主要是要其保值增值。而产权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很好地保值增值，这是市场经济的通则。国有资产如果不让其流动，必然像冰棍在正常气温下那样，逐渐融化。因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产权的自由流动，是产权流向能取得较高回报率的领域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调节资源配置的生动体现。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成了思想大解放，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① 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5月13日。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其中首要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思想理论界掀起了对“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以及批判“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等热潮。但当时最大的思想禁锢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冲破，就还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这样的路子是再也走不下去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指“两个凡是”，让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原来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两个凡是”。这样一个思想大解放，为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人们很容易想到，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再搞下去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因为，新中国成立 30 年的实践表明，只有改革束缚广大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传统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发展自己，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路子，中国才有希望，社会主义才有希望。

2008 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 30 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决策是正确的，既符合党心民心，又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起飞，从 1978 年到 2007 年，年均 GDP 增长达 9.7%，比全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高出一倍多。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人均 GDP 达到 2500 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光是农村贫困人口就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使大家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而且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已达 20% 以上。

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不只是经过 30 年的实践才被证明的，而是在作出决策后不久就因其迅速取得成功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功而被证明的。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改革更凸显了市场的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逐步放开农副产品、小商品、工业消费品等价格，由市场调节，它们很快就像泉水般涌流出来，其价格在开始时有所上涨但很快就



稳定下来，上百种原来凭票供应的商品一个个取消票证，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我国迅速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买方市场”新格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市场化改革使老百姓普遍得到实惠，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因此势不可挡。

改革开放使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几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只留下个体经营14万户，从业人员15万人。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使经济日趋活跃、市场日益繁荣、就业不断增加、公众不断受益。目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初步建立，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在发挥自己的优势，并逐步形成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增强经济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同时进行的。对外开放，打开国门，不仅引进了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了对外贸易，而且使国人认识了外部世界，找到了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激发了奋起直追的热情和责任感。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科技加速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非常必要。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近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事实证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市场经济的功能更有效地发挥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还很重，在21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具有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从而使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继续飞驰向前。

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在处于转折关口。经过长时期粗放扩张，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更加突出，严重威胁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要求，指出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是使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根本所在，为此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改革，特别是要靠深化政府改革、财税改革和价格改革。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不能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深化政府改革的要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资源配置的主角，热衷于追求短期GDP增速最大化，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节能减排、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都很难真正落实。

财税改革很重要。现行财税体制使各地都致力于发展重化工业，包括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业，以便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却对发展第三产业不够重视。需要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把政府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加快增值税转型，尽快开征物业税、燃油税，提高资源税，完善出口退税制度，等等，用财税杠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价格是有效而灵敏的经济杠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最重要的是理顺各种要素和资源的价格，使其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大量案例表明，节约能源、土地及水资源等，最重要的是进行价格调整。所以，要实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深化市场化价格改革，利用好和发挥好价格这一市场手段的作用。

坚持改革开放，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将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加强经济理论创新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①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理论创新对开展和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巨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特别突出的，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深入人心，个体私营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个理论的确认，按

^① 原载《中国流通经济》，2008年第9期。



劳动或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创建，公共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外开放理论的不断发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论的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理论等。这些都对中国30年的改革发展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不断打破各种思想束缚，勇于探索和创新，对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经济理论创新过程中，由于认识有先有后，对实际情况的掌握也有区别，特别是有的受经济利益驱使，思想交锋不断，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改革开放并取得令全世界瞩目成效的实践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上面所论述的经济理论创新，不但不是异端学说，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界和政治家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这儿特别加一个政治家，比如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肯定。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没有停止，而是继续深化和发展。比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还终止了许多经济学家所批评的对国有资产“五龙治水”的情况，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向、内容和步骤。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观点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2003年终于被肯定了。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关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形成和完善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包括诸如政府的收入一律要纳入预算，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征物业税，统一企业所得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政治税转型，调整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上市公司股权分置制度，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等等。所有这些理论创新和改革设想，都是为了逐步完善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此期间，经济学家大量的建言献策，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我个人认为，今后应加快推进改革，更好地落实经济理论创新的共识，实现既定的改革方针，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设想（我们党的几次文



件也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点），2010年我们国家要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12年时间了，但改革攻坚任务还很多，且进展缓慢。如果不抓紧加快改革步伐，上述目标有可能达不到，或者打折扣。特别是如果不抓紧加快改革，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就会受到影响。

进展缓慢的改革攻坚任务，我个人认为有这些，比如，政府职能的转化和政企职责的真正分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个角度看更像社会主义市长经济，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中央企业某公司90%以上还是国有独资。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等如何监管的问题至今没有明确。我记得2003年机构改革的时候，说把这些资产怎么改革放一放，这一放已经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现在的《国有资产法》也只是对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进行法律规定。

资源产品价格改革错过了2005年、2006年的良好机遇，现在越来越难改。很大一块地方政府收入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庞大的财政支出，其决策、执行、监督没有很好地分开，资金价格扭曲，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在土地、环保等问题上，地方政府违法现象相当普遍，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还很漫长。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成为老大难问题，近期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等。所以，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不少改革推进难度加大，迫切需要中央的强有力领导和推动。但是，由于发展和稳定方面的事情，急事太多，往往顾不上抓改革问题，给人以拖下去的感觉。希望今后能够切实落实十七大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加大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各项改革，更好地通过改革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孙冶方经济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① ——纪念孙冶方百年诞辰

2008年10月24日，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先驱孙冶方百年诞辰纪念日。孙冶方离开我们已25年。他亲眼目睹改革开放只有四年多，但1979年下半年起即已重病缠身。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经济体

^① 原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制的主张，主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到 60 年代初期八九年间，且正是“左”的思潮和政策逐步泛滥的时期。孙冶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仗义执言，标新立异，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体制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在“文革”前夕即被扣上吓人的“中国最大修正主义者”政治帽子，“文革”中更被投入监狱七年多。1975 年 4 月 10 日，在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孙冶方出狱了。他出狱后在汽车上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充分表现出他的铮铮铁骨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孙冶方永远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楷模和学习榜样。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目前已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改革开放是在经济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带动下深化和发展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的不断出现，已经超越了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的设想和理论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孙冶方的一系列论著，就不难发现，孙冶方几十年前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显现的“天才的闪耀”，至今有不少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还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吸取深化改革开放的力量，这也是本文准备论述的主题。

一、“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是孙冶方 1964 年在一次批判他的经济学观点时回答批判者质问时冲口说出的一句话，此话一出，在座的不论是批判者还是陪同的被批判者（陪同的被批判者有杨坚白、邝日安、何建章、笔者等）都为之震惊不已。批判者认为又抓住了孙冶方的一个大把柄，陪同的被批判者为孙冶方捏了一把汗。实际上，这句话是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概括。十四年后，1978 年，孙冶方在《光明日报》撰文，以此为标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理论观点，说：“我这句话虽然是在激动中脱口而出的，然而这是符合我多少年来长期坚持的思想的。”在我看来，孙冶方这句一鸣惊人的话，不但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实用价值，应看做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在我国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验证。特别是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孙冶方的上述理论概括，其现实意义就更大了。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历来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基本规律，是支配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法则。现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即价值规律的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经济规律。对价值规律的任何违反，都是破坏市场经济法则，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直接意味着确认“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就要重新认识和估价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以便使我们比较自觉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第二，在孙冶方的论述中，价值规律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由等价值量交换规范，也包括价格机制等在内，这样，价值规律自然是商品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和流通的调节者，经济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所以，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要冷静地看到，时至今日，尽管改革开放已搞了三十年，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是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政府拥有的资源过多，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大，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到现在，价值规律调节资源配置、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作用，还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所以，按价值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仍是今后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见孙冶方的价值规律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角度看，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总离不开规律排队，并且总是把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置于首位，以贬低和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还有人拿社会主义经济中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起主要作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可是，还在四十多年前，孙冶方就已提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第一。这就是说，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为中心，来阐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本性和特征。所以，从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来说，孙冶方的论述，时至今日，仍有重大意义。

二、价格政策不应以价格背离价值为特征

孙冶方特别重视价值规律，偏爱价值规律，因此强调在各项经济活动中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他说的等价交换是指等价值交换。20 世纪 60 年代，一次在讨



论会上，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一位同志说等价交换是等价格交换时，孙冶方立即反驳说，等价交换是等价值交换，而不是等价格交换。那时价格是国家制定的，不能认为只要按国家制定的价格交换就算等价交换，因为国家制定价格时，常常违背价值规律的要求，甚至有意地使价格背离价值，通过不等价（值）交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与此相联系，孙冶方还竭力反对所谓没有价格背离价值就没有价格政策的苏式教条（这句话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讲的），强调价格符合价值应是国家价格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且是检验国家价格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现在看得很清楚，在实行政府定价的体制下，必然出现价格关系扭曲，价格结构畸形，破坏等价交换原则。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的。所以，孙冶方反对把等价交换说成是等价格交换是非常正确的，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价格体制的弊病有深刻的洞察力的表现。

孙冶方的上述观点，至今有很强的生命力。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些生产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别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长期以来价格偏低。地价低、粮价低、能源价格低、水价低、资金价格低、污染环境不付费等，实际上鼓励粗放扩张，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同孙冶方一直主张的使价格符合价值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这说明，深化价格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在实践中，深化价格改革，实行正确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价格政策，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原则上认识到理顺价格关系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一碰到一些具体困难，或牵涉到局部利益受损时，又常常把理顺价格关系放在一旁，满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的效益。比如，2005年、2006年，CPI上涨率只有1.8%和1.5%，本是理顺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好时机，经济学家和有关部门也提出抓住良好机遇，尽快调整已严重偏低的资源产品价格的建议，但政府可能是怕提高资源产品价格会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影响经济增速，而没有及时出台调价措施，丧失了难得的机遇。当前，成品油、天然气价格、电力价格、粮食收购价格均严重偏低，很不利于增加供给和资源节约，但是碍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较高了（2008年上半年CPI上涨率为7.9%），不敢提高价格，理顺价格关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不理顺价格关系，对经济的长远的健康的发展



极其不利，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直至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重温孙冶方四十多年前的观点和论述，一点儿也没有过时，对深化价格改革、完善价格政策，仍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1961年6月2日，孙冶方写了一份内部研究报告，题目是《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多年来人们实际奉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说：“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至于体制中的其他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等，在企业的职权问题解决以后，是容易解决的。”^①同年10月，他在南京经济学会上发表讲话时，又说：“现在一般人研究经济管理体制，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认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首先不是中央与地方的体制问题，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那是法学家管的问题，是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角度考虑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考虑，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管理体制。这就是，作为一个独立核算企业它应有多大责任，国家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②那时，孙冶方还提出了划分国家“大权”与企业“小权”的数量界限，即在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属企业“小权”，国家不要去管，而在资金价值量扩大再生产（即新投资）范围内的事，则属需要国家管的“大权”。这种划分对大家研究问题也是有启发的。重要的是，孙冶方提出的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是财政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的崭新观点和思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被18年后中国开始的经济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孙冶方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特别是要尊重企业自主权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仍未完全落实和解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目前，现代企业制度已较普遍建立起来，但是还很不完善。突出的问题是，不少企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



业，政企还未很好职责分开，政府还经常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往往通过项目审批、土地批租、信贷干预、封锁市场、税收征管、市场准入等，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还有，在实现政资分开上，也还有待完善。至今有的地方，还实行地方政府直接持股，尽管那里国资委已经建立。在国资委作为政府代表履行出资人、责任人时，如何做到只当“老板”，不当“婆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不代替公司董事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以及真正做到所有者到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等，也有许多问题要很好研究和解决。这些都说明，孙冶方关于处理好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观点和主张，仍是我国今后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提高经济效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孙冶方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或红线，是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据此，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倡导经济体制改革，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提高经济效果。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益。

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抨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他指出：由于“否定或是低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气魄”。^①对“‘价值’概念的否定，是不可能引出重视经济效果，重视劳动时间节约的结论来的。”^②“由于过去大多数经济学者把未来社会的经济看做是自然经济，所以投资效果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这是最荒谬没有了。资本家使用资本时，很讲究经济效果——投资效果。我们为了同资本家的资本划清界限，把‘资本’改称‘资金’了，把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文字上划清界限是有好处的，但是把‘投资效果’也跟‘资本’一道给否定掉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实际工作中对于投资效果的忽视，理论工作者是要负责的。”^③

孙冶方从必须重视经济效果出发，早在1963年，他不顾好心人劝说，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上报，文中说：“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应该表扬那些努力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先进企业，批评那些不关心和由于主观不努力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而不能为国家创造利润的企业。”“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①这些现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很平常的观点和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被斥为提倡“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这也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体制对经济效益采取何等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孙冶方确信，对传统的旧体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他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旧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体制修修补补，而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充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②

孙冶方一贯主张的建立在尊重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讲求经济效益。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经济核算，更注重劳动生产率，更注重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问题。‘不惜工本’是违背价值规律的。”^③

孙冶方的上述观点和主张，至今仍有指导价值。我们在生产和投资活动中，不讲求经济效益、浪费严重等现象时有发生，形象工程往往不惜工本，豆腐渣工程更是贻害无穷。严格说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际上是不讲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同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大相径庭。我们今天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重温孙冶方的一系列精彩论述，仍是有大教益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④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主要是坚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65～266页。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2～353页。

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

④ 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



持了市场取向改革，为国民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这一成功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柱。

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科学结晶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艰辛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1956～1957年，1959～1964年，我国经济学界前后两次掀起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讨论的高潮。讨论中，一些经济学家对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理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提出了一系列今天看来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主张。比如，孙冶方提出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于光远和卓炯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都是商品，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等等。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毛泽东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均不可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后，我国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一次又一次掀起了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热潮。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主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到会三百多人。会议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企业是有自身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表明，在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取向改革旋即由农村向城市全面展开，市场机制的“魔力”进一步惊人地显现出来，让老百姓普遍得到实惠。20世纪80年代有两次改革成效特别突出：一为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份增长2%～3%的速度，大大增强



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二为价格改革，以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为主，转换经济运行机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哪种商品价格一放开，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市场供应日益丰富。实践证明，在绝大多数领域，由市场配置资源比由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一改革成效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困扰我国几十年的卖方市场格局转变为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买方市场格局。

市场化改革的节节推进和成效日益显露，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就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力地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提高，加快经济增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呼之欲出。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勇于理论创新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确立并成为主流观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79 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下，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起来，并逐渐得到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同。

综上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探索研究的科学结晶。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大步展开

1993 年，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的第二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具体部署。《决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



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向深层次全方位迅速展开。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从过去放权让利转向体制创新，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使国有经济走出困境，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和活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得到增强。

1997 年全国国有企业 25.4 万户，到 2007 年减少到 11.5 万户，减少了一半多，但国有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1997 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3.9 万亿元，到 2007 年增长到 35.5 万亿元。1998 年， $2/3$ 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 213.7 亿元，而到 2007 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 1.7 万亿元，实现大幅度增长。目前，地方国有企业改制面已达 80% 以上，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制面已由 2002 年的 30.4% 提高到 2007 年的 64.2%。在 A 股市场的 1500 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 1100 多家，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 78 户。所有这些均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次，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94 年实行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税制改革，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实行分税制，改变原来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的办法。在分税制中，增值税是最大税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中央得 75%，地方得 25%，消费税则全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税比上年增长部分以 1:0.3 比例返还地方。这一改革一方面促进了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1993 年全国财政收入 4348.95 亿元，而到 2007 年，全国财政收入跃增至 51304.03 亿元，增长（名义增长）了 10.8 倍；另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收入占的比重迅速提高，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22%，而到 2007 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54.1%，这就使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大大增强。进入 21 世纪后，财政体系又进行了重大转型，即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承诺逐步实现对全体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意味着财政支出结构将作重大调整，即大幅度提高用于公共服务的部分，提高用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部分。

第三，2001 年 11 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意义。作出这一决策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中，不少人忧心忡忡，怕“入世”影响国家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商业、农业、信息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七年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都加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06年平均达到15%以上。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许多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

第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1993年、1994年、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达50%以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肯定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到2006年，私营企业达497.4万家，从业人员6396万人；个体企业达2576万家，从业人员7500万人，私营和个体企业营业额已突破6万亿元。多年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是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力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形成了我国多元市场主体竞争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开展。

第五，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进入21世纪，社会领域改革迅速展开：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已全部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从城市扩展至农村；正在积极探索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进展很快，目前已有七亿多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在积极推进；努力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等等。

第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从全能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进了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依法审批，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这期间，还实现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整体上市，进行了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分置改革，取消了农业税，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对一些垄断行业企业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机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等。



由于以上许多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迅速推进，到 2000 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进入 21 世纪，新体制正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完善，以便使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继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并争取于 2020 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得到新体制的依托牢固地树立起来。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立论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相互结合，而不是像传统理论认定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不光要从理论上论证两者能够结合，更要在实践上广泛和反复证明两者能够结合。以往的市场经济都是同资本主义或者私有制相结合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经济科学的划时代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难点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我国已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中，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能够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不但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和国有制是难以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改革开放后，各方面都在努力寻找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推进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并可以在股份制公司制框架下逐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因此，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为现代公司，其中重要的企业实行国家控股（个别的还可国有独资），就可以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公司接轨，不仅可以同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展开平等竞争，而且可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可见，通过股份制，我国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



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要求以人为本，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防止两极分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公共的财政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力地促进和保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前在这方面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比如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公平受到严重挑战，党和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公有制要着力适应市场经济，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这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我们对这一结合的成功实践充满信心，从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科学性充满信心。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生命力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已初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旺盛生命力。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已深入人心，深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实践指南。同时也要看到，国外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至今仍对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结合表示怀疑，国内个别人士也时不时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和问题提出责难。为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说服力，还要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

首先，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新体制的优越性正日益显现，但还不完善，仍有一些改革攻坚任务有待完成，比如，政府职能转换改革、国有中央企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之所以要攻坚，除了这些改革属于深层次，牵涉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外，还在于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这就需要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



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①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工作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总结我国 40 年的经济建设得出的重要的经验教训。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有失误，主要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1984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失误，影响经济和改革的顺利发展。现在，终于找到了病根，并正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0 年中，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由于 1984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在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出现某种失误，用“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强使经济起飞，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结果经济在短时期超高速增长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使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这些问题概括说就是总量失衡、结构失调。国家被迫又一次采取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紧缩经济，着力恢复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增长优先还是稳定优先，各国历来都有争论。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这几年也展开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增长优先论者认为应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稳定服从增长。稳定优先论者则主张稳中求进，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认为应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搞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坚持稳定物价的方

^① 原载《中国物资经济》，1990 年第 1 期。



针。198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前一种意见在实际决策中占了上风，加上传统体制固有的投资饥饿症等膨胀机制继续起作用，不断的经济扩张，急于求成，导致1988年夏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实行牺牲稳定求增长、不断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治理整顿已取得初步成效。工业发展速度逐月回落，1989年9月份已降到0.9%，1989年1~11月，比1988年同期增长7%，预计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7%左右，实现年初预计的指标。农业获得较好收成，1989年粮食产量达到8100亿斤，比1988年增产200亿斤以上，增长3.4%，达到了历史最高年份1984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预计1989年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400亿元，下降10%，如果加上物价因素，实际投资下降20%以上。物价上涨势头有所缓和，1989年社会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幅度不断降低，1月份为27%，上半年为25.5%，8月份为11.4%，10月份降到两位数以下（8.7%），其中35个大中城市零售物价上涨率，1月份为31.3%，9月份为9.7%，预计全年物价上涨幅度可略低于上年。货币回笼情况比较好，由于物价涨势趋缓，银行又开展三年和三年以上保值储蓄，并从1988年9月以来三次提高存款利率，城乡居民储蓄大增，1989年1~9月份共增加1000亿元，使银行信用回笼形势很好，1989年1~10月份，银行尚未发票子，还有少量的净回笼。所有这些，都说明国民经济正朝着稳定方向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在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近两个月回落过猛。1989年9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同期增长0.9%，10月份更出现负增长局面，11月份也只比上年同期增长0.9%。这种状况，首先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就全国来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如果达不到5%，财政收入要同上年持平都困难，很可能会出现下降的局面，而财政支出是很难削减的。为了稳定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水平，1989年财政支出中用于价格补贴的部分还将比上年增加七八十亿元。同时，会提高失业率或待业率。1989年从非农产业转到农业的劳动力的八九百万人，其中建筑队伍就有四五百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对于是否应当和能够坚持紧缩的方针，是否应当和能够继续治理通货膨胀，产生了某些疑虑。对此，五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这就是：继续治理整顿，继续紧缩，力争用三年（包括1989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真正走出困境。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使我国国民经济重



新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其所以正确是因为：

第一，稳定经济必须这样做。为了继续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一般认为这是经济稳定的集中标志），我们要把工业发展速度的放慢，看成是治理经济环境必须付出的代价，咬紧牙关挺住；同时抓紧整顿流通环节混乱状态，堵住各种收入流失的漏洞（据粗略统计，1987年、1988年，每年都有400亿~600亿元被搞投机倒把、转手倒卖等活动的人侵吞了），以弥补财政收入因工业发展速度下滑造成的影响。配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善，拉长短线，压缩长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如果我们在进一步治理整顿期间，能够像近期农业生产得到加强和发展，能源、原材料生产得到较快的增长，加工工业盲目发展的趋势得到抑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逐步恢复总量平衡，改善结构，进入良性循环。

第二，1985年底1986年初和1987年底两次“软着陆”失败也要求紧缩方针必须坚持下去。这两次由于经济过热而不得不实行的紧缩，都因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底下一叫喊，就急急忙忙改变政策方向，重新放松银根，导致更猛烈的投资膨胀和需求膨胀，使矛盾逐渐积累，终于在1988年夏天爆发严重危机。所以，不能期望紧缩能舒舒服服进行下去，必须准备过紧日子。良药虽苦，但利于治病。

第三，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进一步治理整顿，使经济真正稳定下来，极其有利于人心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国际经验表明：经济不稳定，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必然形成和加重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腐败现象蔓延，这些是当今公众最为不满的。经济稳定下来，不但能消除腐败，起码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获取暴利的机会少了，权力转化为商品行贿受贿的范围和程度也会受到较多的限制。

二、经济改革要稳步推进

1987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一文中，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推进，因此，先要用三年（1988~1990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紧缩财政与信贷，只有在宏观经济比例重新协调后，改革才能在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两个方面较大规模地深入展开；在稳定经济期间，改革只能有选择地进行，推进有利于稳定经济的改革，价格改革只能迈小步。同时，“稳中求进”还要求改革本身要稳步推进，不能企求一次



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互相协调和配套、互相促进。当时有的同志对这种改革思路表示不赞成，认为过于保守，不够改革，企图否定“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我认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是有根据的，能够经受住实践考验的。

经济体制改革要“稳中求进”，才能较好地处理改革同发展的关系。改革要不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是几年来一直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改革只能在经济关系紧张的条件下进行，宽松的经济环境是改革的结果，如果改革未基本完成前能够出现宽松的经济环境，就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几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急于求成时，改革也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几次大的价格改革方案，拟订得详细（连调价目录都已印好），但无法出台，就是因为经济过热，经济环境恶化，只好一再推迟，而且改革还容易出现种种“改革病”（如陷入所谓物价、补贴、税收“百慕大三角区”）。在改革完成前，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是不可能的，过去有些年份我国就做到过。1988年9月到1989年底实施紧缩方针以来取得初步成效，包括出现一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缓解了社会总供需矛盾，也说明了这一点。治理整顿并不意味着不要改革了，恰恰相反，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亟须深化改革来配合，用深化改革来促进治理整顿的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在改革过程中要很好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似乎改革可以不顾宏观经济是否许可盲目推进，那就不但会损害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损害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本身也要稳步推进。这是因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求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个别方面孤军突出会搞乱阵脚，出现类似交通秩序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全局系统的改善与变革，涉及地区间、部门间、企业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革，这就需要慎重对待。改革过急，利益关系变动必然过大，就容易引发社会的震荡与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改革的步子稳一些，改革的成本可能高一些，但却不容易翻船，能够避开大的风险比较顺利地到达彼岸。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①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21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五年计划的主线，这在过去九个五年计划从未有过，是针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作出的正确决策。“十五”期间只有把结构问题解决好，才能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有效供给，也才能切实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为了顺利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便为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一、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十五”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后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的五年计划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五年计划的最大不同，就是从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导性计划，计划的实现从行政指令转变为依靠市场机制。在政府、市场、企业关系中，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办好的事，政府都应放手让市场、企业去办，政府主要为市场活动和企业经营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其中维护公开、公平和有序的市场竞争最为重要)，不再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政府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但不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下指标、立项目。无论是农业结构调整，对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升级，加快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还是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加强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都要依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重新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若不然，在结构调整中事事由政府唱主角，政企不分，必然违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扼杀经济活动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进行。

强调市场的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指导和推动必不可少。政府要为市场活动和企业经营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

^① 原载《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12月（总第25期）。



市场秩序，包括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条件，具体来说，政府要做好几件事：一是制订计划或规划，提出明确的长远发展目标，包括制订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一些重要部门的五年计划纲要等。二是运用财政力量，带动社会投资，努力实现五年计划目标。政府投资是政策性投资，主要用于公共需要部门，尽管它只占社会总投资的一小部分，但其支持、带动、示范作用不容忽视。三是制定鼓励和限制的政策，促进计划的实现，如提出和发布鼓励、允许和限制、禁止的产业目录，鼓励到西部投资开发的政策等。四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使其为五年计划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在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重要建议。

首先，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建议》特别强调发展股份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要求今后五年建立起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规范监督机制。未来五年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人们期望在这期间无论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现代公司制改革方面，都能迈出实质性步伐，使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发展非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在市场准入、融资、外贸经营权等方面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

其次，继续提高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扩充市场机制活动范围。“十五”期间，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继续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展商品市场，重点是要素市场。同时进一步放开价格，依法规范各个市场主体的价格行为。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各种有碍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清理形形色色用行政力量妨碍市场竞争和反市场化倾向的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市场就能更好地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第三，深化计划、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在计划体制方面，《建议》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今后，应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和承担风险”的原则，凡属政府鼓励和允许的项目，应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审批最容易带来腐败，应严加限制，并建立对审批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财政税收制度需在1994年改革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很重要，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根除乱收费现象。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年增千



亿元以上，但由于财政支出章法不严，“跑部钱进”现象有加重之势。因此，需推进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实行部门预算，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要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包括创造条件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进利率市场化，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我国人民币已于前几年实现了在经常项目范围内的可兑换，但这还不够，今后还要向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努力。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完善。转变政府职能，重要议题之一是政府从自己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让市场和企业自己管。这也是精简政府机构的前提。当前政府特别是地方基层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过多，迫切需要精简，以减轻农民负担。政企分开仍然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切实解决好的问题。不少政府部门总想插手企业事务，并从中捞取利益，因此不愿放弃手中权力。这靠说服教育和政治动员很难完全奏效，必须从制度上、立法上明确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就是犯法，企业可依法控告。建立国有资本有效管理形式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环节。在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政府是出资者，但政府只是作为公司出资者或出资者之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起作用，像一般股东一样，不能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了一层“隔火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如前所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以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和改善经济结构

《建议》要求在制订“十五”计划时，要全面估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这就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一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扩大对外开放将促进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前，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就是要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将原来没有对外开放或开放不够的金融、电信、旅游、航空、内外贸（包括批发贸易）等领域，逐步（过渡期一般为5年）对外开放。这样，国内有关企业在外资拥入的竞争下将面临巨大压力，它们必须充分利用几年过渡期使自己真正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完善机制，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



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否则就有破产倒闭和被兼并的危险。由于这些行业长期受到行政力量的保护或处于垄断地位，竞争力差，一旦外资进入，如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将无力抗衡。所以，对外开放这一巨大外在压力，迫使它们除改革外，别无他路。这就自然会带动改革的全面深化。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范约束自己的经济行为。世贸组织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原则，且是开放的较规范的市场经济原则。我国要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体制、法规、政策等都要同市场经济的国际规范接轨，不能我行我素。比如，商品自由流通是市场经济的最起码要求，然而至今我国还有一些部门和地区搞行政垄断和地方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一些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内市场自由流通，这显然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所以，扩大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也迫使我们进一步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拆除各种地方壁垒，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深化改革要求扩大开放，而扩大开放又能促进改革的深化。“十五”期间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扩大开放，推动改革全面深化，使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起来。

其次，扩大对外开放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十五”期间，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推进城镇化，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利于顺利完成上述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将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中国由于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有可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000亿美元，比1999年的404亿美元多近1.5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的增加，将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好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开发西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例如，扩大开放领域，允许外资进入银行、保险、旅游、电信、内贸、外贸等行业，虽然会使这些行业的企业受到强烈冲击，但同时能提高这些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水平。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将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技术进步是实现“十五”计划的巨大动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技术水平总体上仍有较大差距。为此，要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人才，利用后发优势，



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技术跨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与此同时，要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扩大开放，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包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改组和改造国有企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企业、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工成本低、一般技术人才多，是我国较突出的优势。在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我国完全可能成为许多商品的世界制造基地，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升我国的产业水平，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扩大对外开放，还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跨国投资，承接劳务项目等。我国有一些重要资源，如石油、木材、铁矿石等，需要到国外建立生产基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又有不少商品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在国外也有需求，完全可以到国外投资建厂，输出生产设备向当地提供产品；还可以承接更多的工程项目和劳务项目，输出更多劳动力，赚取更多的外汇。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结构。

三、根据经济形势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对宏观经济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的问题。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有一定独立性，需专门论述。《建议》提出，根据经济形势实施相应宏观调控政策。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促进消费。还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调节货币供应量，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这就对“十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作了明确规定。

我国从1994年以来，鉴于出现通货膨胀，提出要实施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还存在“软预算约束”，从而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不少经济专家认为，在体制转轨时期，都需实施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在1997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治理后，又逐渐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内需不足，增长速度相继下滑。中央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相应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突出表现为连续几次降息）。丰富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过冷，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就要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就要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建议》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作出的比较全面的概括，避免了片面性。

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为当前内需仍然不足，通货紧缩现象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①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 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根据我学习的体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是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 20 年翻两番，年均增长 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840 美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3000 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上述指标是以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不变为前提计算的，根据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经济起飞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如果中国也是这样（可能性很大），那么，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按美元计算有可能更高。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体内容则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完成将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工业化一般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由于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而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人工成本低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加快发展金融、物

^①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12 期。



流、旅游和咨询及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等。通过以上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体现于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优势，而应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较大优势，同时农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建成独立完整的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是以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而是处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等。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程一般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多，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加上城乡分割体制根深蒂固，致使我国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有些滞后。2000年和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50.2%和51.2%，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3.7%和44.4%，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36.2%和37.7%，大体低7~13个百分点。这是造成我国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和难以从根本上快速解决的重要原因。

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特别重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单列一题叙述，这是在过去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过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只有初步实现城市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50%以下），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益，才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普遍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论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又跳出农业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肯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还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



重大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使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年均约提高0.8个百分点，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所以，今后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展大城市和发展小城市各有优势。中国有2000多个县城和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如果每个平均吸纳10万个农民进来，全国可以吸纳两亿多农民进城。农民进入小城市的门槛比较低，限制比较少，这是发展小城市的优势。但是也不能只发展小城市。50万或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较高的集聚效应，城市功能可以得到较充分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也大，是现代文明的集中地，这是发展大城市的优越性。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既要发展小城市，也要发展大城市，不能片面地只强调其中一面。

加快城市化进程，要积极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工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包括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此同时，要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革除农民进城工作的种种障碍，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等，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对农民的歧视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都有待逐步克服。做到了这一点，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劳动力这一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才能在全国自由流动，更好地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在21世纪头20年有可能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年将增加0.8%~1%，从而使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和超过50%，初步实现城市化。

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基础上，再经过30年的努力，使我国经济总量在30年内再翻两番，年均增长4.7%，我国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现代化包含工业化，但实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就实现现代化，后者的要求更高。



经济发展要有新思路^①

在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发展要有新思路，经济发展更是如此。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几个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体会。

一、21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即21世纪头20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加快现代化，曾有不同的认识。不少省市特别是东部一些省市，都提出加快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有的同志主张用加快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许多同志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2000年，我国人均GDP854美元，不仅同当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27443美元有很大距离，而且同当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2039美元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1153美元也有较大距离。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没有达到小康收入水平，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农村有28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有近20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根据这样的国情，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是，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看到，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21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

^①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而且目标不那么张扬，不会给外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就全国整体水平而言的。有条件的地方，如东部一些省市，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用 20 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要到 21 世纪中叶才能做到。

二、一个主题——21 世纪头 20 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讲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还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快速发展。因此，21 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主题就是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0 年，我国年均 GDP 增长 9.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 年，我国 GDP 达 8.94 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超过 1 万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 年我国 GDP 总量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 6 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认为，我国 2000 年 GDP 已达到 4 万亿美元。由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 年全世界中下收入国家人均 GNP 为 756 美元以上，我国当年人均 GNP 已达到 780 美元。2000 年，我国人均 GDP（由于我们利用不少外资，因而人均 GDP 略大于人均 GNP）为 840 美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了一个台阶，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从 21 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心就是要用大约 20 年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其基础和主题，则是要在这 20 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做到每 10 年翻一番，20 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长 7.18%。这个速度虽然比前 22 年低一些，但是仍属高速或快速发展范畴。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说明，实现上述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工作做得好还有可能超过。

中国具有并将继续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拥有世界上最富裕的劳动力资



源，正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把各种生产潜力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今后20年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然经济增长率，能保持7%~8%的平均增长水平，超过日本、韩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的时间。2001年和2002年前三个季度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增势不减，仍实现7.3%和7.9%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经济具有相当强的活力和发展势头。

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经济2001~2020年年均GDP增长7.18%，同期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3%，则中国人均GDP到2010年为1592美元，2020年为3027美元，同期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分别为2513美元和3097美元。可见，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跃升到世界第3位，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4%上升到占8.4%。

要在21世纪头20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制定和实施恰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我国制订了三步走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即到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党的十五大以来和十六大，又进一步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再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1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11年到2020年，经济总量力争再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三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经济总量大体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完善发展思路，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重大方针政策。首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趋势，发展要有新的思路。概括来说，一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保护，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其次，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实施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重大方针政策。比如，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应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立足点。当前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当长时期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更积极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战略等。



第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2000年底，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到处可见，严重影响经济潜力的发挥。进入21世纪，改革还要求有新的突破，即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调整所有制结构、深化企业改革、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理顺分配关系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取得成功，将最有力地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开放也要有新局面，即要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21世纪新阶段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般指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过程。我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由于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都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已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而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经济效益好，三是资源消耗低，四是环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前四条是根据我国人均资源短缺^①和适应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发展的要求，第五条则是根据中国人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国情提出来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在政务、商务和国民经济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在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用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工业化的标志已不再主要体现在工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总量中占优势，而应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00年人均耕地面积世界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2000年人均淡水资源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2000年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



GDP 总量中占较大优势，同时农业增加值在 GDP 总量中的比重，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建成独立完整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占越来越大比重；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不是以拼资源、拼能源、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而是处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使用，回收再用，重复利用，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等等。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同重视发展科技教育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要研究。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特别重视，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单列一题叙述，这是过去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过的。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论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又跳出农业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肯定，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市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还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至 2001 年已达 37%，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占 63% 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 50%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 15%。所以，今后在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要更有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可以说是发展新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认真研究诸如用城市化概念好还是城镇化概念好、城市化道路如何走、发展小城镇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五、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

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这是适应新阶段新形势（如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一般商品买方市场格局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的正确选择。调整经济结构，除了上面已论述的调整城乡结构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一是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生物、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在政务、商务、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二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包括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三是继续加强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改造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项目。四是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旅游和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未来大规模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做到了以上几点，我们就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调整地区结构，实施西部大开发，更是要从各地区实际出发，发展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加强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国家的支持和本地的努力，加快西部地区开发，首先要遏制与东中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然后才能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也许这要2020年以后才能做到。

十六大报告对如何推进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养和用好各类人才。为做到这几点，国家主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西部地区则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加快建设现代化，其难点在西部地区。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所以，西部大开发关系全国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①

加快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和最紧迫的任务。十年前，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曾经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从那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1980~2002年，单位GDP能耗下降66.8%^②但不理想，因为我们原来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现有的成就尚未达到根本转变的目标。转变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前一段粗放型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尚未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时期则不同，粗放型经济扩张已走到尽头，不转变已经不行了。还有，这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涵也不限于从粗放外延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而是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重要内容。

一、资源“瓶颈”制约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我国经济和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26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3年以来9%以上的GDP高速增长，一部分行业（如建材、钢铁、电解铝等）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由于前期投资过热而陆续出现生产能力过剩。^③与此同时，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2004年为人均1.41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还将减少。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① 原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② 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4月，第6页。

③ 商务部材料，2005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特别是钢铁、电解铝等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严重。（《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8月20日）



世界平均水平的 1/4，且时空分布不均。目前 600 多个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缺水，110 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4.5% 和 79%；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6、1/6 和 1/9。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 1990 年的 5% 上升到目前的 50% 以上。2003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 2.67 亿吨，进口石油 9700 万吨，对外依存度为 36%。2004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 2.92 亿吨，进口石油 1.23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 42.1%。2004 年，我国铁矿石进口 2.08 亿吨，对外依存度 40% 左右。2005 年铁矿石进口将进一步提高至 2.4 亿吨，^① 占世界自由贸易量的 50% 以上。铜精矿和氧化铝消费量的 50% 都依赖进口。中国资源进口不断增加，也助长了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自 1999 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上涨了约 4 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 年上涨 30%，2004 年上涨 80%，2005 年初上涨 71.5%。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 年，我国 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 GDP 的 4%，但消耗了全球 8% 的原油、10% 的电力、19% 的铝、20% 的铜和 31% 的煤炭。^② 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 8 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40% 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 2~3 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 15%~25% 和 20%^③。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 30%，城市水的回用率也仅为 30% 左右^④。

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几近极限。2003 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 680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 1334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硫排放量 2159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90% 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由于用煤导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全国七大水系 38% 的断面属五类及劣五类水质，90% 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大部分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污染面积仍在扩大，赤潮灾害频繁发生；全国近一半的城镇水源地水质不符合原水标准，农村尚有近 3 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酸沉降、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物已经在城市密集地区构成严重的区域性污染。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国占了 6 个。2005 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

① 《经济日报》，2005 年 4 月 9 日。

② 《中华工商时报》，2005 年 6 月 26 日。

③ 《人民日报》，2005 年 6 月 26 日。

④ 《中国经济时报》，2005 年 7 月 1 日。



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居第 133 位^①。

与此同时，生态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7%。沙化土地面积 174 万平方公里，且有扩展之势。草原超载过牧，乱采滥挖严重，鼠虫灾害频繁，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草原面积的 90%。

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九五”计划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方针以来，我国粗放型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仍未实现根本性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格局未变。进入 21 世纪后，各地热衷于发展重化工业和耗能高产品，能源弹性系数大幅度提高，能源的瓶颈制约特别突出，情况如下表：

时期	GDP 增长率（%）	能源消费增长率（%）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1981 ~ 1990	143	64	0.44
1991 ~ 2000	162	32	0.2
1996 ~ 2000	48.8	0	0
2001 ~ 2004	43.1	46.7	1.08
2004	10.1	16.1	1.5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的年鉴》。

针对这种严峻情况，中央《建议》在提出“十一五”期间的目标时，除了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 2010 年人均 GDP 比 2000 年翻一番，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等外，特别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 20% 左右，即能源弹性系数要降到 1 以下，节约能源成为节约资源的重点。还要求，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实现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为

^① 《经济参考报》，2005 年 7 月 14 日。



此，必须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强化环境和生态保护，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关系“十一五”规划能否顺利实施的全局性问题。

二、从体制机制方面逼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我国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除了要实施有利于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源资源的方针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以外，主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根本转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在现行的财税制度下，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更多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而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产品价格因为受到政府管制明显偏低，以及可以不支付环境污染成本，鼓励人们对资源的低效滥用和浪费。表现在：

一是地价低，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权力向农民低价征地，然后办开发区等，用低价出让土地招商引资。近年来，在农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过程中，各种压低补偿安置标准的行为和各种寻租行为等侵害农民权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导致群体上访事件不断发生。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上半年统计，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占信访部门接待量的73%，其中40%与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有关，87%与征地补偿标准偏低有关。国家信访部门2003年受理土地征用上访4116件，大部分与农民失地失业有关。

二是水价低，2003年，我国城市的每立方米水价为0.15美元，农用水几乎是免费的，而国外每立方米水价南非是0.47美元，美国是0.51美元，德国是1.45美元。各个城市水价普遍偏低，广州市居民用水价格0.9元/立方米，总体看目前仅为国际水价的1/3。2005年上半年，我国水行业全行业亏损。

三是能源价包括煤价、油价、电价低。中国的燃油税是美国的1/10，是欧洲的3%~5%。大量高耗能产品之所以争着出口，是因为中国能源价格低。

四是矿产品价格低，我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2万个矿山企业是要付费取得矿山开采权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行政授予无偿占有的。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率为1.18%，而外国一般为2%~8%。我国石油、天然气的费率仅为1%，远



远低于美国的12.5%和澳大利亚的10%。

要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使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等。通过深化改革，用经济杠杆迫使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财税体制和政策怎样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和任务，这当中，深化财税改革，完善财税政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要完善预算制度，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统筹安排使用，接受人大和公众的监督。前一段，主要是城市政府的土地收入和一些收费与基金等预算外资金，往往被地方政府用于搞开发区、市政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式扩张，造成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滥用浪费，引发经济走向过热。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经济的行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充当地方经济活动主角的不正常状况，必须从财力上防止上述不规范的政府行为的发生。实践证明，游离于预算的统一规范管理之外几千亿上万亿元的资金，其使用的不规范、不透明，不仅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成为腐败的土壤，而且必然助长追求短期效益的粗放式增长。因此，必须深化预算改革，真正实现预算硬约束，使财政资金真正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设立和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开征资源税有利于抑制对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和掠夺性开采，有利于保护矿产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但我国的资源税的征收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我国在矿业权取得环节，存在大量无偿使用的问题。我国大部分矿山企业都是采取行政授予无偿使用矿山开采权的，少部分有偿使用矿山开采权的矿山企业的付费水平也过低。因此，有必要普遍实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提高税率或补偿费率，运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的节约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施燃油税。目前我国汽油虽已纳入消费税范围，但税率低，需单独开征燃油税，将公路养路费、过桥费、过路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等纳入燃油税中。按照



原来设计的方案，实施燃油税后，汽油的销售价格每公升将提高1元多人民币，即提高20%多。实施燃油税，将会有力促进汽油的节约使用，提高对汽油等紧缺资源的有效利用。

取消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我国是能源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出口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等于出口能源和资源并带来环境污染。取消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

稳步推进物业税，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物业税又称房地产税，根据对房产和土地的评估价值征税。谁的房产多，谁就要多缴税，而且不是一次性多缴税，而是每年都要多缴税。这样，就能适当抑制对房产的需求，不会鼓励人们多买房、买大房等着升值牟利，而是要考虑支付房地产税的成本，从而控制对房产的过度需求，有利于防止房地产业泡沫的出现。

最后，要对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发展循环经济、节能节材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保护生态和环境行为等，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四、深化价格改革，要点是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难转变，是因为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受国家管制，严重偏低。资金的价格低，地价低，水价低，能源包括电价低。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节约利用资源，提高效率。我国能源价格长期偏低，比价也不合理。2004年国内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比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进口到岸完税价格的平均水平分别低791元/吨、837元/吨；国内汽、柴油零售中准价较三地市场进口到岸完税价格的平均水平分别低231元/吨、335元/吨。国际上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价关系大体为1:1.5:1.35，而我国实际大致为1:4:3，煤价明显偏低。国际上天然气与原油按热值计算比价平均为1.05:1，而我国为0.4:1，天然气价格偏低^①。电

^① 中国价格协会联合课题组：《“十一五”时期深化能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研究》（2005年5月），第6~7页。



力价格也偏低。因此，要节能，首先要调整过低的能源价格。国外有的经济学家曾对 2500 家公司做过一次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 55% 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17% 是研究与开发的结果，还有 12% 则源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其余则归结为工业所占份额的变化^①。中国是淡水短缺的国家，可是水的利用效率较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的水资源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的 4 倍，重要原因是水价低。国际普遍流行的水价构成包括水资源价格、水工程成本、水处理成本及水管理成本，而且还包括污水处理的成本。而我国的水价只包括水工程成本、水处理成本和污水处理费。可见，要节约用水，必须提高水价，用价格杠杆来限制水的滥用浪费。国外的一些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研究结果是，水价从每立方米 7.9 美分提高到 13.2 美分，用水量减少 42%；从 15.9 美分提高到 21.1 美分，用水量减少 26%^②。我国东部一些城市有这样的经验，有限的水资源如何分配给企业，是政府计划分配，还是用公开拍卖谁出的价高卖给谁的办法，事实证明，用后一种办法能最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说明价格杠杆的作用是非常见效的。

2005 年经济增速很快（上半年达 9.5%），而物价上涨率低，CPI 上半年为 2.3%，7 月份为 1.8%，8 月份为 1.3%，远低于国家发改委规定的“两条控制线”，即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环比上涨率超过（含达到）1%，或连续三个月同比超过（含达到）4%，该省、市、自治区就要暂停调价（指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部分）三个月。2005 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趋缓；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于多数供过于求，竞争激烈，难以上涨；农产品价格也较平稳，因而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正有利于逐步提高资源产品价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台一些调价措施。

在理顺各项资源产品价格中，重点是调高能源价格，包括要尽快出台燃油税，提高汽油价格。还要逐步调整煤、天然气、电的价格。提高能源价格，是降低能源消耗系数的有效途径。此外，要提高矿山资源补偿费；水价应计算水资源价格，污水处理费要能补偿成本并略有利润；严禁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城市经营性土地价格一律公开拍卖，严防“暗箱操作”；等等。

提高水、电、油等价格后，要考虑对农民和低收入群体提供某种补助，包括适当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

此外，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仍需继续推进，还要

① 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 年 12 月，第 70 页。

② 殷治平：《我国水价改革历程及改革趋向分析》，载《中国物价》，2003 年第 4 期。



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也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而逐步完善。技术价格已基本由市场形成，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在这前提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等。

五、推进其他方面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合力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要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的大错位。政府不能办企业，这是早就明确了的，怎么能去做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城市呢？2003年以来，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形象工程，大搞开发区和市政建设，个个都要工业立市，铺摊子，上项目，外延式扩张，引发经济走向过热。资料显示，2003年以来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成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①。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政府改革和转换职能已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今后，政府应当着力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联合国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提出，用相对适度的财政支出政策，就可以大大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比如，便利地获取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及医疗保健信息，可以预防75%以上的孕产期死亡和降低70%以上的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还要改变公共服务不平等状况。比如在健康领域，政府2/3的支出服务于40%的城市人口。各地政府每年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异很大，从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人均200元人民币到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不足20元人民币。^②

其次，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政府职能没有很好转换或者转换不到位，关键是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不完善。不少地方官员，包括从事妇联、教育、卫生

① 《理论动态》，2005年6月25日第1674期，第8页。

② 《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年7月。



等工作的官员，也分配“招商引资”指标。以贱卖土地（甚至政府赔本进行土地开发）越权减免税等办法争取外资，甚至与外商站在一起，侵犯劳工合法权益。在片面追求GDP增长驱动下，资源的滥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都可以放在一边。不改革这种干部考核体制，就无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再次，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产权归属清晰、保护严格，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会自动地追求质量和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深化企业改革，就要使长期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和常常受到歧视的民营企业，都成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自负盈亏和独立承担风险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并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为此，既要引导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更要深化国企改革。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机制缺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大企业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企业逐步退出，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对于仍需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垄断行业的改革需加快推进，积极引进竞争机制，允许新的厂商参与竞争，特别是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要放开。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则要加强监督，包括安全、环保、价格、普遍服务等监管。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有的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即通过招标的形式，在某些产业或业务领域（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特许经营权），在一定质量要求下，由提供最低报价的企业取得特许经营权。这样，就能使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并增进效率。垄断行业资源节约的潜力巨大，搞好垄断行业改革，能大幅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此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外贸的质量、效益和利用外资的质量等，都将使我国经济运行逐步走上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轨道，从而使我国经济持续地实现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
2. 《2005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5月。
3. 世界银行：《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2004年12月。
4. 《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为重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2005年7月12日～13日。
5.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究》，2004年4月。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这作为“十一五”时期最突出的任务。温家宝总理在向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报告时，把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要切实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大家知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建议中就提出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今天又重提和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究竟这次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10年前提出这一命题，除了基本要点相同之外，还有哪些区别或发展，为什么现在显得特别紧迫，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区别或发展有以下几点。

一、“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加快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和最紧迫的任务。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曾经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那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1980～2002年，单位GDP

^① 原载《宏观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能耗下降 66.8%，但不理想，因为我们原来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现有的成就尚未达到根本转变的目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前一段粗放型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尚未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时期则不同，粗放型经济扩张已经走到尽头，不转变已经不行了。

我国经济和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 27 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 2003 年以来 9% 以上的 GDP 高速增长，一部分行业（如建材、钢铁、电解铝等）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今后还可能会有其他行业由于前期投资过热而陆续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据商务部材料，2005 年前 5 个月，39 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 19%，特别是钢铁、电解铝等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严重。与此同时，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粗放型增长已难以为继。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左右，2004 年为人均 1.41 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还将减少。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5%，且时空分布不均。目前 600 多个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缺水，110 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4.5% 和 79%；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7%、17% 和 11%。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 1990 年的 5% 上升到目前的 50% 以上。2003 年，我国石油消费量为 2.67 亿吨，进口石油 9700 万吨，对外依存度为 36%。2004 年，石油消费量为 2.92 亿吨，进口石油 1.23 亿吨，对外依存度达 42.1%。2004 年，铁矿石进口 2.08 亿吨，对外依存度 40% 左右。2005 年铁矿石进口将进一步提高至 2.4 亿吨，占世界自由贸易量的 50% 以上。铜精矿和氧化铝消费量的 50% 都依赖进口。我国资源进口不断增加，也助长了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自 1999 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已上涨了约 4 倍。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2003 年上涨 30%，2004 年上涨 80%，2005 年初上涨 71.5%。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 年，我国 GDP 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 GDP 的 4%，但却消耗了全球 8% 的原油、10% 的电力、30% 的钢材、19% 的铝、20% 的铜和 31% 的煤炭。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 8 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40% 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 2~3 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 15~25 个和 20 个百分点。矿



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 30%，城市水的回用率也仅为 30% 左右。

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几近极限。2003 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为 680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 1334 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 2159 万吨，居世界第一，90% 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由于用煤导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全国七大水系 38% 的断面属五类及劣五类水质，90% 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大部分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污染面积仍在扩大，赤潮灾害频繁发生；全国近一半的城镇水源地水质不符合原水标准，农村尚有近 3 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酸沉降、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物已经在城市密集地区构成严重的区域性污染。世界 10 大污染城市，我国占了 6 个。2005 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 144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我国居第 133 位。

与此同时，生态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37%。沙化土地面积 174 万平方公里，并且有扩展之势。草原超载过牧，乱采滥挖严重，鼠虫灾害频繁，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已占草原面积的 90%。

总之，“十一五”时期，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成为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是这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 10 年前提出同一问题的最大的不同点。

二、“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有新的扩展和具体化

10 年前，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含义还比较简单、抽象。经过 10 年的发展，大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等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并且明确了具体要求。这当中，具有新意的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突出资源能源节约。“十一五”规划《建议》在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是基于当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严重制约，因此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把节约资源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足见其重要性及意义。这次《建议》在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时，除了提出要实现 201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以外，特别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就把资源能源节约的要求具体化了。

其次，着力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实现主要由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再次，强调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环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次《建议》专门写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三个方面，总的是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关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可见被重视的程度。而这个问题在10年前尚未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没有引起特别重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绿色风暴席卷全球，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呼声越来越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深入人心，经济发展要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于使经济运行走上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从而使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三、对“十一五”时期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九五”计划建议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作出了原则规定，但还缺乏具体的落实措施。“十一五”规划建议除了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战略任务以外，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落实这一根本性转变任务。有许多方针政策和改革举措就是直接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体会，《建议》对我国“十一五”时期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深化改革，形成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首先，要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



实现产业发展由高消耗、低效率转向低消耗、高效率，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大家知道，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在重大技术装备、核心技术方面长期受制于人。现在看得很清楚，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鼓励应用技术研发机构进入企业，大型骨干企业应在行业技术进步中发挥带头作用，支持小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增强创新活力。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增加科技投入，加大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投入，使研究与开发投入从 2004 年占 GDP 的 1.35% 提高到 2010 年的 1.5% 以上和 2020 年的 2% 以上，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而目前全世界 20 个创新型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均占 GDP 的 2% 以上。我们的邻国韩国研究与开发投入已占 GDP 的 3%，印度 2005 年研究与开发投入也将占 GDP 的 2%，均高于我国。我国还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创新环境。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等等。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除了要实施有利于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源资源的方针政策以外，还须深化改革，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第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要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的大错位。2003 年以来，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和建设形象工程，大搞开发区和市政建设，个个都要工业立市，铺摊子，上项目，以致引发经济走向过热。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经济的行为，因而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政府改革和转换职能已经成为今后深化改



革的关键环节。

第二，深化财税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促使各地热衷于粗放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因为这样GDP增速快，财税收入高。今后要建立与事权相适应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体制；财政资金不再投资于一般竞争性产业，而要投向公共服务领域；规范土地收入管理办法，将土地收入和专项基金等预算外收入统纳入预算管理；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进物业税；降低和取消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等等。

第三，深化价格改革，重点是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企业服务的意识。

四、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科学发展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必须加快发展促调整，加快调整促发展，促进调整和发展良性互动。

（一）突出自主创新

以北京建立创新型城市为契机，支持企业大力开展自主创新。企业要充分利用首都人才和智力资源，增加研发和技改投入，力争市属国有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增长到3%以上，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研究将企业创新纳入考核范围，形成创新激励机制。积极支持企业实施品牌经营战略，不断提高品牌运作水平，提升北京传统品牌的内在价值和科技含量。

（二）强化内部管理

企业要积极学习国际上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而不断丰富的管理思想，牢固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广泛吸收新的管理信息，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大力改革创新组织体系，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机构，提高组织运行绩效。要加强基础管理，完善制度，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积极引进现代先进的管理技术，尤其是要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水平。

（三）发展循环经济

全面落实市委“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5%左右的目标要求，加大研发并推广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为建设节约型城市、建设节约型社会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贡献。



（四）实施走出去战略

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要充分利用好国际经济结构调整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技术等要素，缓解我国原材料、环境压力，促进高新技术发展，拓展结构调整空间，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另一方面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以成熟技术和设备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①

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经济经过2003～2005年跃进式发展后，需要适当放缓增长速度，并致力于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以利于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一、“十一五”确定年均GDP增速7.5%、2006年GDP增速8%比较实事求是

《纲要》确定“十一五”年均GDP增速7.5%，《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6年GDP增速8%，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适当放缓。我认为，确立这样的预期性指标，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我国经济从2003年到2005年，连续三年平均增速达两位数（10%），整个“十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速也达9.5%，而不是原来公布的8.8%。连年国民经济异常高速增长，一方面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看到，这几年经济的迅速扩张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部分行业由于过去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钢

^①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力、汽车和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和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使许多企业出现亏损，且亏损企业亏损额有增加趋势。

二是资源消耗过度，特别是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十五”期间竟超过1，其中2003年达1.53和2004年达1.59。情况如下表：

时期	GDP增长率（%）	能源消费增长率（%）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1981~1990	143	64	0.44
1991~2000	162	32	0.2
2001	8.3	3.4	0.41
2002	9.1	6.0	0.66
2003	10.0	15.3	1.53
2004	10.1	16.1	1.59
2005	10.4	10.6	1.02
2001~2005平均	9.6	10.2	1.07

资料来源：《2005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

由于资源过度消耗，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其中石油40%以上）。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低，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居第133位。^①还有，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中科院2006年2月28日发布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排序，我国位列绩效最差

① 《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14日。



国家之一，排在第 54 位。^①

三是加大了收入差距。在经济过热中，一些小煤窑主、房地产商、钢铁企业老板发大财，一夜暴富，而职工、农民等一般老百姓增收不多，引发比较普遍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怨言。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目前已达 0.45，超过公认的 0.4 的警戒线，比美国还高。

以上情况表明，“十五”期间特别是 2003~2005 年的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粗放型扩张，同时这种粗放型扩张到“十五”期末已差不多走到尽头，难以为继。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今后，特别是“十一五”时期，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带有根本性和深远影响意义的关键问题。

为了在“十一五”时期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摒弃多年来拼资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扩张的做法，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引导各方面致力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致力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经济增长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十一五”时期年均经济增速 7.5%，今年 8% 是现实可行的，既属于快速增长范畴，又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当然，遏制盲目粗放扩张势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减轻攀比心态，也是实现上述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的经验证明，粗放扩张，最有利于实现短期的高速增长，而要切实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则要作比较长期艰辛的努力。比如，一项比较重要的科技发明并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一般需要六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超过政府一届的任期。指标一高，实际上鼓励人们的短期行为和粗放扩张。适当放缓增速，就能促使大家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当前需着重防止投资继续过快增长，而不是防止通货紧缩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不是怕增速掉下来的问题，通货紧缩问题，而是怕投资继续过快增长，经济增速居高不下，继续粗放扩张，为今后长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2006 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各方面要求加快发展的劲头很足。2007 年

^① 《文汇报》，2006 年 3 月 1 日。



要开党的十七大，各地方为追求更好政绩，还是热衷于加大投资，上项目，而且互相攀比。似乎谁的GDP增速快，谁的政绩就好，谁就能得到提拔重用。在这种情况下，要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落实3月份“两会”精神，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放松，特别是需要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

鉴于从2003年起，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三年都在25%（名义值）和20%（实际值）以上，显得过高。2006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预期增长18%。应当说，这是比较切合实际，有助于抑制投资过热的指标。但是，这一预期指标从一开始就被突破。2006年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高不下，仍达26.6%（名义值）和24.2%（实际值），说明投资增速还是过高。预计，200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主要在投资高速增长带动下，将超过8%的预期目标，甚至达到9%以上。^①

有的经济学家对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看得很重，担心出现或者认为已经出现通货紧缩，为了避免或者克服通货紧缩，主张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扩大消费和投资。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在我看来，尽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06年也不太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当前产能过剩，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总量过剩，即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的过剩问题并不突出，还没有出现总的生产能力过剩，没有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第二季度以后的情况还有待观察。只有投资大幅度增长，出现更多行业和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才会导致总供求失衡，带来通货紧缩。相信在中央政府加强和不断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很难出现。

其次，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扩大内需，是可行的，也符合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的要求。政府增加对“三农”的投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也能有效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因为农民收入的提高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转化为消费，从而活跃农村市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5.3%和支出增量的21.4%。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现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并不是很高的，今后需继续提高。还有，3000多亿元即使全部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8

^① 国内有十几家研究或预测机构预测中国2006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均为9%或9%以上。见《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6年第4期。



万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只占很小一个比重，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社会投资，而由于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效果不高，市场吸引力不大，所以不能期望短时期内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扩大内需有很大作用，而是需要经过比较长时期（一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有明显效果。

再次，通货紧缩意味着物价的持续下跌，看来今年内不太可能出现。今后，在推进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原来各种资源产品价格偏低的扭曲现象将逐步纠正，水价、油气价、电价、地价、矿产品价格将上涨，从而将直接和间接导致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再加上国际市场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会提高国内相关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这些都将抵消一些消费品因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2006年，1~2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说明从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断小幅上涨的势头还在继续，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国家发改委把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率控制在3%，我想主要也是考虑上述因素作出的。3月下旬，我国成品油开始提价，只是调整资源产品价格的一个开端，而且还没有到位，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预计今后各地方都将陆续出台提高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和收费措施，从而使居民消费价格很难下跌。看来只要今年粮价不出现大的波动，年物价上涨率估计同去年（1.8%）差不多。

三、“十一五”时期最突出的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和最紧迫的任务。十年前，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曾经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从那以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1980~2002年，单位GDP能耗下降66.8%^①，但不理想，因为我们原来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现有的成就尚未达到根本性转变的目标。转变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前一段粗放型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尚未到难以为继的地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也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时

① 王梦奎主编：《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4月，第6页。



期则不同，粗放型经济扩张已走到尽头，不转变已经不行了。十年前，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含义还比较简单、抽象。经过十年的发展，大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求等的认识有了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建议》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并且明确了具体要求。这当中，具有新意的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突出资源能源节约。“十一五”规划纲要在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是基于当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因此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把节约资源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可见其重要性与意义。

其次，着力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转变，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真正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最后，强调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环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十一五”《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可见其重视程度。而这个问题在十年前尚未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没有引起特别重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绿色风暴席卷全球，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呼声越来越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深入人心，经济发展要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于使经济运行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从而使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还有，“九五”规划建议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作出了原



则规定，但尚缺乏具体的落实措施。“十一五”《纲要》除了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战略任务以外，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以落实这一根本性转变任务。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律法规、完善鼓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针政策。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三是深化改革，形成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而在这几个方面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逼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

“十一五”期间，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价格、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要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不能因此就自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主角，主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企业。“经营城市”是政府职能的大错位。政府不能办企业，这是早就明确了的，怎么能去做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城市呢？2003年以来，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和形象工程，大搞开发区和市政建设，个个都要工业立市，铺摊子，上项目，外延式扩张，引发经济走向过热。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成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调控地方政府盲目扩张经济的行为，因而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政府改革和转换职能已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今后，政府应当着力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联合国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提出，用相对适度的财政支出政策，就可以大大改善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比如，便利地获取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及医疗保健信息，可以预防75%以上的孕产期死亡和降低70%以上的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还要改变公共服务不平等状况。比如在健康领域，政府2/3的支出服务于40%的城市人口。各地政府每年人均卫生保健支出差异很大，从北京市和上海市的人均200元人民币到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不足20元人民币。^① 联合国驻华机构的上述意见，

^① 《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箴言》，2005年7月。



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与此相联系，要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政府职能没有很好转换或者转换不到位，关键是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制度不完善。不少地方官员，包括从事妇联、教育、卫生等工作的官员，也分配“招商引资”指标。以贱卖土地（甚至政府赔本进行土地开发）越权减免税等办法争取外资，甚至与外商站在一起，侵犯劳工合法权益。在片面追求GDP增长驱动下，资源的滥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都可以放在一边。不改革这种干部考核体制，就无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其次，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产权归属清晰、保护严格，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会主动地追求质量和效益型的经济增长，否则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深化企业改革，就要使长期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和常常受到政策歧视的民营企业，都成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经营决策权、自负盈亏和独立承担风险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并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为此，既要引导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更要深化国企改革。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机制缺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更好地集中在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大企业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企业逐步退出，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对于仍需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要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垄断行业的改革需加快推进，积极引进竞争机制，允许新的厂商参与竞争，特别是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要放开。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则要加强监督，包括安全、环保、价格、普遍服务等监管。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有的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即通过招标的形式，在某些产业或业务领域（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特许经营权），在一定质量要求下，由提供最低报价的企业取得特许经营权。这样，就能使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并增进效率。垄断行业资源节约的潜力巨大，搞好垄断行业改革，能大幅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前一段，主要是城市政府的土地收入和一些收费与基金等预算外资金，往往被地方政府用于搞开发区、市政形象工